



# 真理报

第十二期

2026年3月

马列毛主义将开辟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



新人民军57岁生日快乐！菲  
律宾人民战争万岁！战无不  
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万岁！何塞·西松同志  
万岁！

劳动解放社，中国马列毛协会报刊编辑小组

特别鸣谢：法国人民之火主席：张同志

毛

主

席

语

录

“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九四三年六月



## 时事评述

- ★ 论古巴抗议 1-7
- ★ 纪念马克思同志诞辰143周年 8-13
- ★ 修正主义对人民的战争 14-19
- ★ 庆祝菲共新人民军成立57周年：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学习持久人民战争的革命经验 20-24
- ★ 论315-一场官僚资本的狂欢 25-30

## 百家争鸣

- ★ 论政权问题 31-37
- ★ 再论建党问题 38-44

## 不周山下

- ★ 无地者之日：帝国主义政策与无地危机 45-46

- ★ 团结起来，支持印度人民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法西斯莫迪政权！  
停止“卡加尔行动”！ 47-48

## 历史文献

- ★ 雇佣劳动与资本（第四部分） 49-50

## 导师语录

51



# 论古巴抗议

引言：马列毛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根本批判立场

修正主义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它以“社会主义”或“反帝”的名义，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破坏世界革命。毛主席早在1960年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这一科学论断，已被历史反复验证，从赫鲁晓夫的苏联到今天的古巴，无一例外。古巴现政权——以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及现任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为代表的所谓“古巴革命”——绝非什么“社会主义特例”或“拉美独特道路”，而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式修正主义的拉美翻版。它披着民族解放和反美外衣，实质上早已蜕变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向官僚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是当代反修正主义斗争中最具典型性和欺骗性的反面教材。

从马列毛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出发，我们必须坚持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帝国主义论和毛主席在《论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不断革命理论。民族民主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坚强领导，如果不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必然倒退为依附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1959年古巴革命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具有一定的反帝进步性，这是必须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加以肯定的。但其领导核心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游击队（“26日运动”），缺乏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基础，未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式的群众专政机关，也未开展彻底的土地革命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这就埋下了修正主义蜕变的种子。革命胜利后，古巴迅速倒向苏联修正主义，接受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路线，放弃了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旗帜，最终走上了与帝国主义妥协、依赖外援、取消群众监督的修正主义死胡同。

当前2024-2026年席卷古巴的持续抗议浪潮——尤其是2026年3月中旬中部城市莫隆的暴力事件——正是这一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长期的能源危机（全国性大停电）、粮食短缺、通货膨胀和民生凋敝，并非单纯的“美帝封锁”所致，而是“和平过渡”“依赖外援”“放弃阶级斗争”这一整套修正主义方针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总爆发。群众自发的“cacerolazo”（敲锅抗议）、封路乃至焚烧党部，反映了底层工农对官僚特权阶层的愤怒，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抗议目前仍停留在自发经济诉求阶段，缺乏马列毛主义先锋队的领导，因此极易被境外反动势力或自由派异见分子利用，风险转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方向。

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批判方法，就是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既同情古巴人民群众的正当不满，又坚决批判其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局限性；既肯定1959年革命的反帝遗产，又彻底揭露其未完成向无产阶级专政质变的致命缺陷。这一引言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全球马列毛主义者提供一个分析范本，号召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必须重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在古巴及整个拉美地区领导第二次革命——

一场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人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埋葬古巴修正主义政权，完成1959年革命未竟的历史使命。

历史蜕变：从民族民主革命到修正主义复辟的必然过程  
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表面上看是拉美民族民主革命的一次重大突破，但从马列毛主义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审视，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深刻的内在缺陷，并迅速走上了修正主义蜕变的必然道路。这不是偶然的“外部压力”或“独特国情”造成的“例外”，而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集团在缺乏无产阶级政党坚强领导、未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必然向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规律体现。毛主席在《论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民族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并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否则必将半途而废，甚至倒退为新殖民地或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古巴的历史进程，正是这一论断的活生生反面教材。

## 1. 1959-1961年初期进步性与内在缺陷

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26日运动”游击队推翻巴蒂斯塔亲美独裁政权，实行土地改革、没收美国垄断资本企业、开展扫盲运动和医疗普及，这些措施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进步性，赢得了古巴工农群众的广泛支持，也在国际上鼓舞了拉美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然而，这一革命的领导核心并非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部分中产阶级出身的游击战士组成的松散联盟。“26日运动”从未建立起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也未在农村开展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建立工农兵苏维埃），而是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模式。革命胜利初期，古巴共产党（原人民社会党）被边缘化，卡斯特罗集团实际掌握权力，这就决定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无法自动上升为社会主义革命。

内在缺陷暴露得尤为明显：未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而是迅速形成了以卡斯特罗个人权威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未开展深入的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教育，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占据主导；土地改革虽有进步，但保留了大量官僚管理和国家资本主义成分。这些缺陷，为后续修正主义蜕变埋下了伏笔。马列毛主义认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质变”关键在于是否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专政，而古巴在此阶段恰恰停留在“民族解放”的低级阶段，未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 2. 1960年代转向苏修：从反帝到依附修正主义的转折

1961年4月，美国策划的“猪湾入侵”失败后，古巴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但这一“宣布”并非真正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迅速倒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卡斯特罗集团接受苏联的核保护伞和经济援助，公开拥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路线，放弃了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旗帜。1968年，古巴甚至公开支持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然背叛。

这一时期，古巴经济全面纳入苏联经互会体系，接受苏联廉价石油和糖业出口补贴，实质上成为苏修全球战略中的一个“加勒比前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正高举反修大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古巴却选择与苏修同流合污，拒绝毛主义“继续革命”理论。这标志着古巴革命从民族民主阶段向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蜕变正式开始：党政军官僚集团开始形成特权阶层，群众路线被官僚命令主义取代，国际主义被苏修霸权主义工具化。

### 3. 1970年代制度化修正主义：苏联模式的“古巴化”

1975年，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宪法，确立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体制，引入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官僚管理体制和“生产党”模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FAR）与苏联克格勃式情报机构深度融合，军队不仅掌控经济命脉，还成为修正主义统治的支柱。所谓“社会主义宪法”虽然写着“工人阶级领导”，但实际权力掌握在脱离群众的党官僚手中，无任何群众监督机制，更无文化大革命式的“大鸣大放大字报”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这一制度化过程，彻底阉割了1959年革命的反帝内核，使古巴成为苏修阵营的“模范卫星国”。经济上，高度依赖苏联援助的单一糖业出口模式，导致工业基础薄弱、农业集体化流于形式；政治上，压制党内不同意见，清洗任何倾向毛主义的左派力量。边缘情况值得注意：当时部分拉美左翼曾幻想“古巴道路”是“不同于苏修的创造”，但历史证明，这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苏修羽翼下的一种变种，最终服务于修正主义全球战略。

### 4. 1990年代“特殊时期”加速资本主义复辟

1991年苏联解体后，古巴进入所谓“特殊时期”，经济崩溃、通胀失控、粮食危机爆发。面对生存压力，卡斯特罗集团被迫推行“开放”政策：允许美元合法流通、开放旅游业、引进欧洲和加拿大外资、批准农民自营经济和黑市交易。这一系列措施，实质上是和平演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步骤。国有企业官僚化管理与外资合资企业并存，形成“双轨经济”——一边是党政军特权阶层掌控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边是迅速滋生的黑市资产阶级。

“特殊时期”暴露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致命弱点：长期依赖外援、放弃自力更生和群众动员，导致经济脆弱不堪。古巴政府虽仍高喊“反帝”，却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资本低头，允许外资剥削古巴工人。马列毛主义视角下，这正是“和平过渡”路线的必然恶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持续革命，社会主义外壳下早已复辟了资本主义关系。

### 5. 2000年代至今“更新”与“21世纪社会主义”骗局

劳尔·卡斯特罗上台后推行“经济更新”政策，进一步市场化：扩大自营经济规模、通过外国投资法吸引资本、与委内瑞拉马杜罗修正主义政权结盟获取石油。2018年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接班后，继续这一路线，宣称“21世纪社会主义”，实则是与俄罗斯、中国等当代修正主义政权结成“新修正主义国际”，共同维护官僚资本主义利益。2021年“7·11”抗议后，古巴政府虽做了一些表面让步，但核心是进一步开放市场、依赖俄罗斯石油和中国“一带一路”贷款。

当前2024-2026年能源危机与抗议浪潮，正是这一长期复辟过程的集中爆发：委内瑞拉石油供应因美国干预中断后，古巴全国大停电、粮食短缺，证明“依赖外援+市场改革”的修正主义模式已走到尽头。官僚特权阶层继续享受特供，而底层工农却在停电和通胀中挣扎，这正是毛主席所批判的“走资派”当权后必然出现的两极分化。

总结这一历史蜕变：古巴从1959年民族民主革命起步，却因领导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本质、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倒向苏修并制度化修正主义，最终完成向官僚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挫折”，而是修正主义必然灭亡的铁律证明。只有坚持马列毛主义，不断革命、群众路线、自力更生，才能避免此类悲剧。

理论路线批判：古巴修正主义的三大核心背叛

古巴修正主义政权的本质，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或“反帝堡垒”，而是对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系统性背叛。它以“古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外衣，掩盖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向官僚资本主义演变的实质。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践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修正主义正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其上台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古巴修正主义的三大核心背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继续革命与群众路线、背叛世界革命与国际主义——构成了其理论路线的反动内核。这些背叛不是孤立的“政策失误”，而是贯穿1959年革命以来的必然逻辑，已在2024-2026年持续抗议浪潮（尤其是2026年3月莫隆事件）中得到彻底暴露：群众自发焚烧党部、敲锅抗议，正是对官僚特权和修正主义统治的愤怒爆发。

1. 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从“工人阶级领导”到党官僚+军队寡头统治

古巴宪法虽堂而皇之地写着“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权力早已异化为以古巴共产党高层、革命武装力量（FAR）和情报机构为核心的官僚寡头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工农兵群众通过苏维埃式代表机关直接行使权力，而古巴却取消了任何形式的群众监督机制，代之以自上而下的党官僚命令主义。军队（FAR）不仅掌控经济命脉（如旅游业、酒店集团），还直接介入政治镇压，成为修正主义政权的“御林军”。这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完全对立：国家机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保护新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工具。

具体表现：高层官员及其子女享有特供商品、西方留学机会和海外资产，而底层工农却在2026年全国大停电中挣扎求生（哈瓦那等地一天停电10-20小时，医院、垃圾处理系统瘫痪）。2026年3月莫隆事件中，民众冲入共产党党部焚烧家具，正是对这种“新资产阶级”特权的直接反抗，却被官方定性为“破坏行为”。修正主义者宣称“古巴无阶级矛盾”，实则是掩盖两极分化：官僚集团通过国有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形成食利阶层，而群众则被排除在决策之外。毛主席教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古巴却将专政变成“稳定压倒一切”的官僚统治，彻底背叛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传统。

边缘情况：部分左派曾幻想古巴“人民民主”比苏修更“民主”，但2021年“7·11”抗议后的大规模逮捕和2026年网络封锁证明，这不过是修正主义欺骗群众的幌子。没有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监督，任何“社会主义”外壳都会迅速腐朽为国家资本主义。

2. 背叛继续革命与群众路线：拒绝“斗私批修”，推行官僚“统一思想”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文化大革命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长期存在，必须通过“斗私批修”、大鸣大放大字报和群众运动不断清除党内走资派。古巴修正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拒绝毛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推行“统一思想”“党的纪律”来压制任何批评声音。古巴共产党从未开展过真正的整风运动或群众路线实践，而是将卡斯特罗个人崇拜和党官僚权威神圣化，任何对政策的质疑都被扣上“反革命”或“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帽子。

2026年抗议浪潮中，这一背叛暴露无遗：莫隆民众高喊

“¡Libertad!”（自由）和“烧掉一切！”，本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自发表达，却被迪亚斯-卡内尔政权定性为“暴力破坏”，并迅速逮捕5人、切断网络。这与毛主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教导背道而驰。古巴政府表面“承认民众对停电的不满正当”，实则通过秘密警察和亲政府游行（2026年4月哈瓦那反帝自行车游行）来转移矛盾，拒绝从路线高度进行自我批判。历史对比：1959年革命初期尚有一定群众动员，但1970年代后彻底官僚化，取消了任何可能威胁特权阶层的“继续革命”机制。

这一背叛的危害在于：它使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得以和平演变，群众路线被形式化的“群众大会”取代。结果是经济政策僵化（依赖外援、市场化“更新”），民生危机积累，最终引发2024-2026年从圣地亚哥到哈瓦那的分散抗议。马列毛主义认为，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防止修正主义；古巴的教训再次证明，放弃继续革命就是自掘坟墓。

3. 背叛世界革命与国际主义：从“反帝”口号到帝国主义链条上的依附环节

真正的国际主义是支持全球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的人民战争与革命，而古巴修正主义却将“国际主义”扭曲为苏修全球争霸的工具。1960-1980年代，古巴输出“医生外交”和军事顾问（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尼加拉瓜），表面援助第三世界，实质是替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争夺势力范围、镇压当地左派革命力量。这与毛主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号召完全对立。

当前，古巴进一步暴露其依附本质：2026年能源危机后，急于与俄罗斯达成石油交易、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合作，甚至在特朗普政府加强制裁下仍幻想“对话”。所谓“反美”口号早已沦为空洞宣传——它反对的是具体制裁，却从未支持拉美真正的人民战争或毛主义政党建设。相反，古巴与委内瑞拉马杜罗、尼加拉瓜奥尔特加等当代修正主义政权结成“新修正主义国际”，共同维护官僚资本主义利益，成为帝国主义全球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2024-2026年抗议中，这一背叛的后果显现：群众不满不仅针对国内停电，更隐含对“反帝”谎言的觉醒。古巴政府组织“亲政府反帝游行”来转移视线，

却无法掩盖其依赖外援的寄生性质。马列毛主义国际主义要求输出革命、支持人民战争，古巴却输出“稳定”与“市场改革”模式，成为拉美左翼的负面教材。

总结这一理论路线批判：古巴修正主义的三大背叛相互勾连、相互强化，构成了其从“社会主义”外壳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完整逻辑链条。它证明了毛主席“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的科学预见。当前危机不是暂时的“困难”，而是路线错误的总爆发。只有重建马列毛主义先锋队，领导古巴工农进行第二次革命，才能彻底清算这些背叛，重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阵线。

经济政策与当前危机：修正主义导致的结构性崩溃

古巴修正主义政权的经济政策，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列毛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路线。它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适应性调整”，而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集团在缺乏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情况下，逐步引入市场化、依赖外援和官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发展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否则必然陷入依附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阵营的结构性危机。古巴的“经济更新”“混合经济”和长期外援依赖，正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式“和平过渡”路线的拉美翻版，已在2024-2026年持续抗议浪潮（尤其是2026年3月莫隆事件）中彻底暴露：全国性大停电、粮食短缺、通胀失控和底层工农的愤怒爆发，不是“外部封锁”的简单后果，而是修正主义经济路线积累的内在矛盾的总爆发。它证明了“市场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等骗局的破产，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办工业、自力更生，才能避免此类结构性崩溃。

1. 能源与粮食危机的根源：外援依赖与忽视群众动员的必然恶果

古巴经济长期建立在单一糖业出口和外援基础之上，这正是修正主义“和平过渡”路线的核心缺陷。1959年革命后，古巴未开展毛主义式的大规模群众性工业化运动（依靠工农群众自力更生兴办小型工业和农业机械化），而是迅速倒向苏联修正主义，接受廉价石油和糖业补贴，形成了对经互会的结构性依赖。1990年代“特殊时期”后，又转向委内瑞拉马杜罗修正主义政权（另一个“21世纪社会主义”失败案例）的石油援助，以及俄罗斯、中国等当代修正主义国家的贷款和投资。

2026年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推翻马杜罗政权）导致石油供应链断裂，直接引发全国电网多次崩溃（哈瓦那等地一天停电10-20小时，影响医院、公共交通和垃圾处理）。古巴政府一贯将此归咎于“美帝封锁”，但马列毛主义科学分析指出：封锁只是外部条件，根源在于内部路线错误——忽视本土群众动员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集体化与粮食自给。结果是能源基础脆弱、粮食进口依赖（通胀下购买力崩溃），黑市投机盛行。2021年“7·11”抗议与2026年莫隆事件的共同经济根源，正是这一外援依赖模式下底层工农的生存危机：食品价格飙升、药品短缺、停电导致日常生活瘫痪。毛主席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古巴修正主义却选择了寄生式“依赖外援”，最终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暴露脆弱性

2. 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表现：旅游业、外资与黑市形成新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和平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尔·卡斯特罗及迪亚斯-卡内尔推行的“经济更新”政策，包括扩大自营经济、外国投资法、旅游业开放和美元合法化，形成了“双轨经济”：一边是党政军官僚控制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腐败横行），一边是外资企业和黑市滋生的私人资本。

旅游业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桥头堡：欧洲、加拿大资本涌入酒店、度假村，官僚特权阶层通过合资企业分享利润，而古巴工人却沦为廉价劳动力，外汇收入优先用于进口奢侈品而非民生。黑市投机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一部分人通过美元交易和走私致富，底层群众则在通胀中挣扎。国有企业官僚化管理导致资源浪费、工人积极性低下，与毛主席“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完全对立。

2024-2026年危机中，这些表现暴露无遗：粮食短缺并非“天灾”，而是市场化“更新”下农业集体化流于形式、进口依赖加剧的结果。莫隆民众焚烧党部、封锁道路，正是对官僚特权和新资产阶级剥削的直接反抗。修正主义者宣称“混合经济”是“创新”，实则是列宁批判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新形式下的复活：表面“社会主义”，内核是官僚资产阶级剥削工农。

3. 边缘与差异：社会福利的退化及“如果坚持毛主义道路”的对比

古巴曾以免费医疗和教育闻名，这在革命初期确有进步意义。但在修正主义统治下，这些福利已严重退化：药品短缺（医生大量外派“创汇”而非服务国内群众）、医院因停电无法正常运转、教育质量因资源不足下降。2026年抗议中，群众不满不仅针对停电，更指向福利体系的空壳化——官僚集团享有特供医疗，而普通民众只能依赖黑市。

若古巴坚持毛主义路线（自力更生、群众办工业、农业学大寨式集体化、继续革命防止特权），则完全可避免当前困境。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面临帝国主义封锁，仍通过群众动员实现了工业和农业的独立发展。古巴的教训在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集团拒绝“斗私批修”，必然导致福利异化为宣传工具，而非真正服务工农。边缘情况值得警惕：部分西方左派或“粉红”势力仍幻想“古巴模式优越性”，但2026年危机彻底戳穿了这一神话——修正主义下的“福利”不过是延缓矛盾的暂时麻醉剂，最终会以更剧烈的危机形式爆发。

4. 启示：危机证明“市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必然失败，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防止复辟

2024-2026年古巴经济崩溃再次印证了毛主席“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的科学论断。“市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等修正主义变种，表面缓和矛盾，实则加速资本主义复辟：它腐蚀党的肌体、培养新资产阶级、瓦解工农联盟，最终引发群众自发反抗。当前抗议虽仍以经济诉求为主，但已蕴含推翻修正主义政权的革命潜力。

只有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清除党内走资派、坚持群众路线和自力更生，才能真正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古巴危机不是“社会主义的挫折”，而是修正主义必然灭亡的铁证。

它为全球马列毛主义者提供了反面教材：任何放弃继续革命的经济政策，都将走向结构性崩溃。

总结这一经济政策批判：古巴修正主义经济路线从外援依赖到市场化复辟，构成了当前危机的完整链条。它与前三部分的理论背叛相互印证，证明了修正主义政权的全面腐朽。只有重建马列毛主义经济路线，领导工农进行第二次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迈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

对2024-2026年抗议浪潮的具体分析

2024-2026年古巴持续抗议浪潮，是修正主义统治下长期积累的阶级矛盾的必然爆发。它不是孤立的“民生不满”或“外部势力挑动”，而是古巴修正主义政权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放弃继续革命、推行资本主义复辟路线的总结果。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深刻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会激化，如果党内走资派当权，不开展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斗争，这些矛盾就会从非对抗性转向对抗性，甚至演变为推翻修正主义统治的革命行动。当前抗议浪潮——从2024年3月圣地亚哥的起始，到2026年3月中旬莫隆的暴力升级——正是这一规律的生动体现。它既反映了古巴工农群众对官僚特权和民生崩溃的正当愤怒，又暴露了自发斗争的局限性，证明了只有马列毛主义先锋队的领导，才能将经济抗议提升为推翻修正主义政权的政治革命。

1. 抗议的进步意义：群众自发反抗对官僚主义的愤怒爆发

抗议浪潮的核心是底层工农对修正主义统治的直接不满。2024年3月17-18日，抗议从圣地亚哥-德古巴（古巴第二大城市）开始，民众因食品短缺和持续停电走上街头，随后波及全国。2025年抗议虽较分散，但记录已达上万起。2026年2月6日哈瓦那Arroyo Naranjo区的“cacerolazo”（敲锅抗议）标志着夜间自发形式的兴起，而2026年3月13-14日莫隆事件则达到了高潮：起初是和平集会抗议食品价格高涨和长时间停电，随后部分群众转向暴力——向当地共产党党部投掷石块、砸窗，冲入大楼拖出家具在街上焚烧，高喊

“¡Libertad!”（自由！）和“烧掉一切！”。社交媒体视频显示火光冲天，这是近70年来首次直接攻击共产党办公场所，极为罕见，体现了群众对党官僚特权阶层的深切仇恨。这些行动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它们打破了修正主义长期维持的“稳定”假象，戳穿了“古巴社会主义”外壳下的官僚资本主义本质。敲锅抗议利用停电的黑暗掩护，保护了参与者的匿名性；焚烧党部家具则是对修正主义“统一思想”和特权生活的直接否定。毛主席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古巴群众的自发行动，正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后对走资派统治的自发反抗。它证明了即使在高压统治下，工农群众也不会永远沉默，修正主义路线必然引发群众觉醒。

2. 局限性批判：缺乏马列毛主义先锋队领导的自发性弱点

尽管具有进步性，但2024-2026年抗议浪潮仍停留在自发阶段，这是其根本局限。抗议多为分散、夜间、低强度形式（敲锅、封路、反政府涂鸦），缺乏统一的革命纲领和组织领导。莫隆事件中虽有“自由”口号，但未上升到明确推翻修正主义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治高度。部分抗议者仍是朴素的经济诉求（如要电、要粮），未与马列毛主义理论相结合。

这一局限源于修正主义长期镇压的结果：古巴共产党从未允许真正马列毛主义力量的存在，任何倾向继续革命的左派都被边缘化或清洗。同时，群众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容易陷入朴素反抗或被境外势力利用。2026年抗议虽波及哈瓦那、圣地亚哥等地，并有大学学生因停电干扰教学而参与，但整体上未形成全国性有组织起义。这再次印证了列宁的论断：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自发斗争若无先锋队领导，必然难以持久或被镇压/篡夺。

边缘情况：部分抗议视频显示群众自发性极强，但也存在零星枪声和受伤报告，反映了在黑暗中保护隐私的同时，也增加了无序风险。若无马列毛主义支部深入其中，这些自发行动可能流于短期发泄，无法转化为持久革命力量。

### 3. 政府回应的反动性：表面让步掩盖下的镇压与欺骗

迪亚斯-卡内尔政权对抗议的回应，彻底暴露了修正主义的虚伪与反动本质。它表面“承认民众对停电的不满正当”，却迅速将莫隆事件定性为“暴力破坏”和“破坏行为”，逮捕至少5人，并通过切断互联网、部署秘密警察来预防组织化。2026年4月，政府反而组织大规模亲政府“反帝”游行（哈瓦那青年骑自行车、摩托沿海滨大道，总统本人出席），企图转移矛盾、展示“人民团结”。

更具欺骗性的是所谓“人道措施”：2026年4月3日释放2010多名囚犯（包括部分政治犯），表面回应国际压力，实则是迫于危机而做的战术让步。同时，古巴政府与美国展开“对话”（迪亚斯-卡内尔3月底公开承认），并接受俄罗斯石油援助，试图通过外部输血维持统治。这些回应不是真心悔改，而是修正主义“稳定压倒一切”路线的延续：镇压暴力部分，收买温和诉求，转移视线至“美帝封锁”。这与毛主席批判的“右倾机会主义”完全一致——对群众斗争一手镇压、一手欺骗，拒绝从路线高度进行自我批判。

2021年“7·11”抗议后同样的大规模拘留和网络管控，证明了修正主义政权的镇压本性从未改变。莫隆事件后官方媒体的报道，刻意淡化群众正当诉求、夸大“破坏”，正是官僚主义掩盖阶级矛盾的典型手法。

### 4. 革命战略建议：将自发抗议转化为马列毛主义领导的政治革命

面对当前抗议浪潮，马列毛主义者的任务不是简单“支持”或“谴责”，而是深入群众、输出革命理论、重建先锋队组织。具体战略包括：

1. 秘密建立马列毛主义支部，深入工厂、农村和大学，将经济诉求（如要电、要粮）提升为“推翻修正主义官僚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治纲领。

2. 开展群众路线工作：通过小范围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卡斯特罗主义”的修正主义本质，警惕“颜色革命”或自由派异见分子（美帝资助的“异见”组织）篡夺领导权。

3. 准备长期斗争：利用停电等客观条件开展隐蔽宣传，同时警惕政府“释放囚犯”“对话”等战术性让步，防止群众被麻痹。

4. 国际层面：全球毛主义者应声援古巴群众，同时批判“21世纪社会主义”骗局，为拉美重建真正共产党积累经验。

只有这样，自发抗议才能避免重蹈2021年“7·11”后被镇压的覆辙，发展为第二次古巴革命——一场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以人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总结这一抗议分析：2024-2026年古巴抗议浪潮是修正主义危机的集中体现。它既证明了群众的革命潜力，又暴露了自发斗争的局限和修正主义镇压的本质。只有坚持马列毛主义科学指导，重建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将这些自发行动转化为埋葬古巴修正主义政权的伟大革命力量。这一部分与前四部分相互印证，进一步揭示了修正主义政权的全面腐朽和必然灭亡。

### 国际角色与全球影响：古巴修正主义在当代反修斗争中的反面教材

古巴修正主义政权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绝非什么“反帝先锋”或“第三世界灯塔”，而是当代修正主义阵营中最具欺骗性和典型性的反面教材。它以“反美”口号和“医生外交”作为遮羞布，实质上充当了帝国主义全球链条上的一个依附环节，同时为其他“21世纪社会主义”政权提供了失败范例。毛主席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和反修斗争文献中反复教导：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坚持人民战争道路，而绝不能与修正主义集团结盟、输出机会主义模式。古巴的国际实践，从1960年代替苏修充当全球争霸工具，到当前与俄罗斯、中国、委内瑞拉等当代修正主义政权抱团取暖，充分证明了其背叛世界革命的本质。

2024-2026年持续抗议浪潮（尤其是2026年3月莫隆事件中群众焚烧党部、高喊“¡Libertad!”），不仅暴露了国内危机，更在国际上戳穿了古巴“反帝堡垒”的神话：群众的自发反抗，恰恰是对这一依附性修正主义路线的愤怒控诉。

### 1. 与帝国主义及修正主义阵营的关系：表面“反美”，实则依附链条上的寄生环节

古巴修正主义长期高喊“反帝”，却从未真正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控制。1959年革命后迅速倒向苏联修正主义，接受军事保护伞和经济补贴，成为苏修在加勒比的“前哨基地”。1962年导弹危机和1968年支持苏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正是其充当工具的明证。苏联解体后，古巴又转向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获取石油，并与俄罗斯、中国等当代修正主义国家深化合作。

2026年能源危机中，这一依附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美国特朗普政府加强对委内瑞拉的干预并实施“石油封锁”后，古巴全国大停电、电网多次崩溃（3月16日甚至出现岛屿范围全黑）。古巴政府急于接受俄罗斯石油援助（一艘俄轮运送73万桶原油抵达哈瓦那），同时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勾连，却仍幻想与美国“对话”。迪亚斯-卡内尔表面谴责“美帝封锁”，实则通过战术性让步（如2026年3-4月释放部分囚犯、开启双边谈判）来维持统治。这充分说明：古巴的“反美”不过是机会主义口号，其经济命脉高度依赖外部修正主义阵营的输血，而非自力更生的人民动员。它已成为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全球链条上的一个脆弱环节——当外部援助断裂时，国内矛盾便如火山般爆发。

边缘情况值得注意：部分“粉红左派”仍将古巴描绘为“抵抗帝国主义的英雄”，但2026年4月哈瓦那等地政府组织的“妇女反封锁游行”和“反帝自行车游行”（迪亚斯-卡内尔亲自参加），不过是转移国内群众视线的欺骗手段，无法掩盖其寄生性质。

## 2. 对拉美左翼的负面示范：“21世纪社会主义”骗局的共同破产

古巴修正主义是拉美“粉红潮”（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等政权）的鼻祖和模板。其“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混合经济、市场化“更新”、官僚资本主义+威权统治——已被证明是新自由主义与修正主义威权的杂交体。古巴长期输出“医生外交”和军事顾问（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表面“国际主义援助”，实则是替苏修/当代修正主义争夺地盘、压制当地真正革命力量，而非支持毛主义人民战争。

当前危机对拉美左翼构成沉重打击：2026年古巴全国黑电网崩溃、粮食短缺、通胀失控，与委内瑞拉马杜罗倒台后的连锁反应相互呼应，证明“依赖外援+放弃阶级斗争”的路线必然导致结构性崩溃。尼加拉瓜、玻利维亚等政权也面临类似民生困境和群众不满，暴露了整个“新修正主义国际”的脆弱性。古巴莫隆事件中群众直接攻击共产党党部、焚烧家具的罕见暴力，正是对这一“社会主义”骗局的愤怒宣判。它警示拉美一切真诚左翼：脱离马列毛主义、拒绝继续革命的“特色道路”，最终只会沦为官僚资本主义或亲美傀儡的过渡形式。

## 3. 对全球毛主义运动的警示：社会主义国家若不持续革命，必将和平演变

古巴危机再次印证了毛主席“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的伟大预见。它为全球马列毛主义者提供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开展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监督、不走自力更生和人民战争道路，就必然从内部和平演变为官僚资本主义，最终在内外矛盾夹击下走向危机。

当前国际形势下，古巴的教训尤为深刻：特朗普政府的加强制裁（石油封锁）、俄罗斯的有限援助、中国的影响力渗透，共同构成了修正主义政权在帝国主义与“新修正主义”夹缝中的尴尬处境。2026年4月古巴释放2000多名囚犯（虽排除大部分政治犯），以及迪亚斯-卡内尔否认“政治犯存在”的言论，进一步暴露了其在国际压力下的虚弱与欺骗。全球毛主义运动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在帝国主义包围和修正主义渗透的双重威胁下，唯有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深入群众、准备持久人民战争，才能避免重蹈古巴覆辙。

边缘考虑：若古巴发生“政权更迭”，可能出现亲美资产阶级傀儡政府或更混乱的“多党民主”，这对革命力量而言既是危险也是机遇。毛主义者必须提前准备第三条道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在“颜色革命”与修正主义之间摇摆。

## 4. 革命启示：古巴危机呼唤拉美与全球的第二次革命浪潮

古巴修正主义在国际上的反面作用，最终服务于世界革命的辩证发展。它教育了广大被压迫群众：虚假的“社会主义”外壳掩盖不了官僚剥削的本质；朴素的“反帝”口号无法替代科学的马列毛主义指导。2024-2026年抗议浪潮虽仍以自发形式为主，但已在国际上点燃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火种。全球毛主义者应当以此为契机：加强理论宣传，深入批判“卡斯特罗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支持古巴群众的正当斗争，同时警惕境外反动势力篡夺；积极在拉美重建无产阶级先锋队，输出人民战争经验。只有这样，古巴的悲剧才能转化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宝贵财富。

总结这一国际角色批判：古巴修正主义从苏修工具到当代“新修正主义国际”的一员，其国际实践与国内危机相互印证，彻底暴露了背叛世界革命的本质。它不仅是拉美左翼的负面示范，更是全球毛主义运动的警钟。只有坚持马列毛主义国际主义、开展持久人民战争，才能埋葬一切修正主义，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阵线。

## 结论与革命号召

古巴修正主义政权已经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1959年革命的进步遗产早已被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集团彻底窃取和出卖。从初期民族民主革命的有限进步性，到倒向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再到制度化官僚资本主义、推行“市场更新”和“21世纪社会主义”骗局，古巴走完了一条完整的和平演变道路。其三大理论背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继续革命与群众路线、背叛世界革命与国际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构性崩溃，以及2024-2026年持续抗议浪潮（尤其是2026年3月莫隆事件中群众直接焚烧共产党党部、高喊

“¡Libertad!”的罕见反抗），共同证明了一个铁的规律：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毛主席的这一科学论断，在古巴再次得到最生动、最无情的验证。

当前古巴全国性大停电、粮食短缺、通胀失控、官僚特权与底层工农的尖锐对立，不是暂时的“困难时期”，也不是单纯的“美帝封锁”造成的外部结果，而是修正主义路线长期积累的内在矛盾的总爆发。它宣告了“依赖外援”“混合经济”“和平过渡”等一切机会主义幻想的彻底破产，同时也暴露了没有马列毛主义先锋队领导的自发群众斗争的局限性。古巴危机不是孤立的“拉美现象”，而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必然灭亡的集中缩影。它为全世界革命者敲响了警钟：任何放弃继续革命、取消文化大革命式群众监督的所谓“社会主义”，都必然走向复辟和崩溃。

## 总结论断

古巴现政权（卡斯特罗-迪亚斯-卡内尔集团）本质上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它表面维持“反帝”口号，实际已成为帝国主义与当代修正主义阵营链条上的一个寄生环节；它曾以免费医疗教育自诩，实际已将这些福利异化为宣传工具和特权阶层的遮羞布。1959年革命未完成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质的飞跃，未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未开展彻底的土地革命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这就注定了其蜕变的必然性。2026年莫隆事件等抗议行动，虽然仍以自发、经济诉求为主，但已蕴含着推翻修正主义统治的革命萌芽。它再次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即使在高压和信息封锁之下，工农群众对官僚剥削的愤怒也不会永远被压制。

古巴的教训是深刻的、全面的。它告诉我们：

- 民族民主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坚强领导和不断革命，就必然倒退；
- 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放弃群众路线和继续革命，就必然复辟；
- 国际主义如果沦为机会主义工具，就必然成为帝国主义链条的一部分。

行动纲领：全球马列毛主义者的革命任务

面对古巴修正主义政权的危机，一切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行动起来，将批判转化为实践。当前的具体行动纲领包括：

1. 深入理论批判：系统研究和宣传古巴从1959年到2026年的修正主义蜕变史，彻底清算“卡斯特罗主义”“古巴道路”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用毛主席著作武装头脑，揭露其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路线的内在一致性。
2. 支持群众正当斗争，同时输出革命理论：坚决声援古巴工农的抗议行动（敲锅、封路、焚烧党部等自发反抗），但必须同时深入群众，批判其自发性的局限性。将经济诉求提升为政治革命纲领：在古巴秘密建立马列毛主义支部，宣传继续革命理论，准备建立工农兵苏维埃。
3. 在拉美重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古巴危机为整个拉美左翼提供了反面教材。必须在拉美各国（包括古巴本土）重建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坚决反对“粉红潮”修正主义政权，准备以人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4. 开展国际主义声援与反修斗争：全球毛主义者应利用古巴危机，批判当代“新修正主义国际”（俄罗斯、中国、委内瑞拉等）的机会主义本质，揭露其对古巴式危机的共同责任。同时警惕帝国主义“颜色革命”和自由派异见分子篡夺群众运动领导权，坚持第三条道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
5. 准备长期持久战：古巴局势动态发展中可能出现政权更迭（亲美傀儡、更混乱的资产阶级民主，或有限松绑）。无论何种情况，马列毛主义者都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深入工厂、农村和大学，积蓄革命力量，迎接第二次古巴革命的高潮。

#### 最终展望

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有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光辉旗帜，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彻底埋葬一切修正主义、一切官僚资本主义，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新世界。

古巴的今天，就是一切修正主义政权的明天。

古巴群众的自发反抗，就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觉醒的信号。

¡Viva el Marxismo-Leninismo-Maoísmo !

¡Abajo el revisionismo cubano y todos los revisionistas del mundo !

¡Viva la Segunda Revolución Cubana bajo la bandera de Mao Tse-tung !

¡Proletarios de todos los países, uníos !



# 纪念马克思同志诞辰143周年

引言

马克思逝世143周年——在帝国主义垂死挣扎时代高举革命旗帜

2026年3月14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逝世143周年的日子。在这个时刻，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经济停滞与恶性通胀并存，帝国主义战争阴云密布，生态灾难加速爆发，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各种修正主义政权纷纷暴露出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古巴2024-2026年持续的能源危机、大停电、粮食短缺，以及2026年3月莫隆事件中群众自发冲入共产党党部、焚烧家具、高喊“¡Libertad！”的抗议浪潮，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生动写照。

143年前，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的简陋寓所里与世长辞。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的悼词中庄严宣告：“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不是为了进行空洞的学术缅怀或资产阶级的“纪念仪式”，而是要在帝国主义全面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的前夜，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彻底批判一切现代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学说的歪曲和阉割，号召全球真正的革命者重建马列毛主义先锋队，领导被压迫人民进行第二次世界革命。

从马列毛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出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教条，而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系统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揭示了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的铁的规律。143年的历史反复证明：每当马克思主义被修正主义者阉割、粉饰、阉割成“和平过渡”“市场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时候，资本主义复辟就接踵而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坚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则，革命事业才能不断向前推进。

当前2026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为我们纪念马克思提供了最现实、最尖锐的战场。特朗普政府加强了对古巴等国的制裁，导致古巴能源供应链断裂，全国大停电成为常态，底层工农群众在黑暗与饥饿中挣扎，而官僚特权阶层却继续享受特供。这充分暴露了古巴修正主义政权“依赖外援”“混合经济”“和平过渡”路线的破产。莫隆事件的群众自发反抗，虽然仍带有自发性和局限性，却已点燃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火种。它再次印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的伟大预言：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因此，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逝世143周年，其根本目的绝不是“缅怀过去”，而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进行一场彻底的反修战斗动员。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剖析帝国主义总危机的根源，揭露当代各种修正主义（包括古巴式“卡斯特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俄罗斯“主权民主”等）的反动本质，总结143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号召一切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行动起来：深入工厂、农村和被压迫群众之中，秘密重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开展群众路线工作，将自发的经济抗议提升为有组织的推翻修正主义统治的政治革命。

纪念马克思，就是要高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既充分肯定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划时代贡献，又坚决批判一切企图把马克思“去政治化”“学术化”的资产阶级歪曲；既同情古巴等国群众的正当不满，又清醒指出其缺乏马列毛主义先锋队领导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2026年这个帝国主义垂死挣扎、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日益成熟的时代，真正继承马克思的遗志，让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焕发出灿烂的光芒。

马克思生平与历史贡献：从革命实践到科学理论的伟大飞跃

卡尔·马克思的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光辉历程。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空谈的学者，而是投身火热阶级斗争的战士；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抽象的哲学体系，而是指导全世界无产者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143年后的今天，在帝国主义全面危机和修正主义政权纷纷暴露复辟本质的时刻，重温马克思的生平与历史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战斗意义。它告诉我们：只有把理论与实践、革命与科学高度统一起来，才能真正继承马克思的遗志，推进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世界革命。

一、早期革命活动与思想形成（1818-1848年）：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质的飞跃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犹太律师家庭。青年时代，他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古典哲学影响，最初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1835年进入波恩大学，后转入柏林大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撰写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已显露出唯物主义倾向。

1842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第一次直接接触现实政治斗争，撰写了一系列揭露普鲁士专制制度、捍卫劳动人民利益的文章。这使他深刻认识到，单纯的哲学批判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

1843年《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流亡巴黎，在那里与恩格斯建立了终生友谊，并深入研究法国工人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

1844年，马克思写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步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本质的异化。这部手稿标志着他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5年春，马克思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著名论断，第一次明确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为辩证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这部划时代的文献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规律，宣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向全世界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

《宣言》彻底清算了空想社会主义，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科学基础之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二、成熟期科学巨著的创作（1848-1871年）：剩余价值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创立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伦敦，度过了长达三十余年的艰苦岁月。他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859年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卷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主要的科学巨著，它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的深刻分析，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彻底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和采用机器生产，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了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最终使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更是一部革命的政治文献，它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

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马克思热情支持公社，及时总结其经验教训，写成《法兰西内战》。在这部著作中，他深刻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论断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国家学说，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

三、晚年国际主义实践与理论深化（1871-1883年）：

第一国际领导与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继续领导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拉萨尔机会主义、普鲁东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不懈斗争。他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独立的政治政党，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

晚年，马克思还深入研究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写下了著名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这些研究表明，马克思从未把自己的理论当作教条，而是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探索革命的不同道路。这为后来列宁在俄国、毛主席在中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因长期过度劳累和贫困，在伦敦逝世，终年64岁。恩格斯在葬礼上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

四、马克思历史贡献的伟大意义与当代启示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最伟大革命。他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明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这些贡献，至今仍是指导世界革命的活的灵魂。然而，必须清醒看到，马克思的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毛主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人民战争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列毛主义。只有坚持这种创造性的发展，反对把马克思学说僵化、教条化或修正主义化，我们才能真正纪念马克思。

143年后的今天，古巴修正主义政权在2026年陷入能源危机与群众抗议的困境，再次证明：如果背离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的基本原理，任何“社会主义”外壳都会迅速蜕变为官僚资本主义。马克思的伟大遗产，不是供人瞻仰的文物，而是指导我们今天进行反修斗争、重建无产阶级先锋队、推进世界革命的强大武器。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当代现实意义：指导世界革命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政治经济学核心，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政治结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严密的、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

143年后的今天，在2026年帝国主义全面危机空前激化的时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非但没有过时，反而以更加尖锐、更加现实的力量照亮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它是指导被压迫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埋葬一切修正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活的灵魂。

一、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彻底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外壳。他们进一步把这一哲学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客观规律。

毛主席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哲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强调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为我们今天分析2026年世界形势提供了锐利武器：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在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空前激化。能源危机、通胀失控、战争频发、生态崩溃，正是这一基本矛盾在帝国主义垂死阶段的集中表现。

古巴2024-2026年的持续危机同样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不是“美帝封锁”这一外部条件，而是古巴修正主义政权长期推行依赖外援、放弃阶级斗争、取消群众监督的内部路线，决定了其经济崩溃和群众不满的总爆发。停电、粮食短缺、通胀这些“社会存在”，必然产生群众“敲锅抗议”“焚烧党部”的“社会意识”。任何企图用“技术问题”“外部阴谋”来掩盖阶级矛盾的做法，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揭露帝国主义掠夺的本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的全部秘密在于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剥削随着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最终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工人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今天，2026年的全球现实再次验证了这一科学预见：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通过金融资本、跨国垄断和高科技剥削，对第三世界进行超经济掠夺；同时，垄断资本的金融化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周期性危机演变为长期停滞与恶性通胀并存的“滞胀”状态。

古巴修正主义政权的经济崩溃是这一规律在“社会主义”外壳下的特殊表现。长期依赖苏联、委内瑞拉、俄罗斯的石油援助和欧洲资本的旅游业投资，实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与国际垄断资本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形式。2026年委内瑞拉政权更迭导致石油断供后，古巴全国大停电和民生凋敝，彻底暴露了“混合经济”

“市场社会主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虚伪性。底层工农创造的财富被官僚特权阶层和外资吞噬，而群众却在黑暗中忍饥挨饿——这正是剩余价值规律在修正主义条件下的残酷体现。

三、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与共产主义两阶段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他科学地划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高级阶段（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共产主义的唯一政治前提。

毛主席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他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必须通过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古巴修正主义政权正是因为拒绝这一真理，才走上了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它虽然在宪法中写着“工人阶级领导”，实际却建立了党官僚与军队寡头联合统治的国家机器，取消了任何形式的群众监督和继续革命机制。2026年莫隆事件中群众直接攻击共产党党部，正是对这种“新资产阶级专政”的自发反抗。

当代现实进一步证明：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任何“社会主义”都会和平演变为国家资本主义。

“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各种修正主义变种，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代理人用来麻痹群众、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

四、当代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世界革命的活的灵魂

2026年的世界，正处于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前夜。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夺、第三世界人民的反抗、全球生态危机与AI技术带来的新剥削形式，都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古巴的能源危机与群众抗议、拉美“粉红潮”政权的纷纷动摇、全球罢工浪潮的兴起，都是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力量正在重新聚集的信号。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它不是提供现成答案的“万能公式”，而是提供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才能看清当代修正主义政权的反动本质；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才能把古巴群众的自发抗议、印度和菲律宾的人民战争、非洲的反帝斗争等分散斗争汇合成世界革命的洪流。

因此，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43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一切“马克思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去政治化马克思”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谬论，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并将其与当代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马列毛主义的旗帜下，将理论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批判当代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歪曲：主要危险仍是修正主义

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43周年的今天，我们绝不能把纪念活动变成温情脉脉的学术仪式，而必须把它变成一场彻底的反修正主义战斗。毛主席早就指出：“修正主义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143年的历史反复证明：每当马克思主义被修正主义者阉割、粉饰、歪曲成“和平长入”“市场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时候，资本主义复辟就接踵而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坚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则，革命事业才能不断前进。当前2026年的现实，再次把这一真理以最尖锐的方式摆在全世界革命者面前：古巴修正主义政权在能源危机与群众抗议中的全面暴露，正是当代修正主义系统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反面教材。

## 一、修正主义的历史根源与演变：从伯恩斯坦到当代“21世纪社会主义”

修正主义从来不是偶然的“政策失误”，而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和共产党内部的代理人。它最早表现为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斯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公开抛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改良”资本主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对其进行了彻底批判，指出修正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词句掩盖下的资产阶级政策”。

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在苏联上台，提出“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世界革命的理论，开启了苏联和平演变的进程。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高举反修大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系统揭露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并把反修斗争推向了新高度。

当代修正主义则以更加隐蔽、更加欺骗性的形式出现。它打着“马克思”“社会主义”“反帝”的旗号，推行“市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21世纪社会主义”等变种。古巴的“卡斯特罗主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马杜罗模式”、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俄罗斯“主权民主”等，都是这一新修正主义家族的典型代表。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在国内取消阶级斗争和群众监督，在国际上与帝国主义妥协或结成新修正主义联盟，实质上是官僚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外壳下的复辟。

第五部分：马克思遗产在全球与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继承与发展：从十月革命到毛主义新阶段）

马克思逝世143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的最深刻方式，不是单纯重复他的原著，而是考察他的科学理论如何在140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被继承、丰富和发展，并从中汲取指导当前反修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随着阶级斗争实践不断前进的活的科学。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马克思的遗产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历史飞跃，最终形成了马列毛主义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发展过程，既是马克思理论真理性的生动证明，也是我们今天在2026年帝国主义危机和古巴修正主义政权崩溃面前，重建革命先锋队、推进第二次世界革命的根本指南。

### 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帝国主义时代与一国胜利论

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列宁科学地分析了这一新阶段，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他发展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强调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他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十月革命的胜利，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它证明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科学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列宁也警告了修正主义危险：第二国际的破产，

正是因为他们背叛了马克思的革命原则，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至今仍是批判当代修正主义“和平过渡”论的最锐利武器。

### 二、斯大林时期的实践与局限：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反修斗争的初步展开

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些成就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能够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斯大林时期未能系统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没有找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形式。在国际上，苏联逐渐走上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后来的反修斗争提供了宝贵财富。毛主席后来指出，斯大林有伟大功绩，但也犯了严重错误，特别是晚年在理论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 三、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马列毛主义的新阶段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毛主席的主要理论贡献包括：

-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无产阶级如何领导农民和其他革命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 人民战争思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重大发展。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主席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他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完整理论，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实践。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它以“斗私批修”为纲，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派，防止了苏联式和平演变在中国重演。虽然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文化大革命后来遭遇挫折，但其基本理论和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宝贵经验。

马列毛主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高阶段。它不是对马克思、列宁思想的简单相加，而是质的飞跃。它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革命、为防止社会主义复辟、为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完整的科学指导。

### 四、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正反经验：从胜利到修正主义逆流教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马克思遗产在东方大国的成功实践。从井冈山到延安，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再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

但是，1976年以后，中国党内走资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改革开放”的修正主义路线，逐步复辟了官僚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官僚特权阶层的结合。它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实际上背叛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的基本原理。这与古巴修正主义政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表面“社会主义”，内核是资本主义复辟。

古巴2024-2026年的危机，正是中国修正主义道路在拉美的镜像：依赖外援、市场化改革、取消群众监督，最终导致能源崩溃、民生凋敝和群众自发反抗。143年的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的遗产只有在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指导下才能得到正确继承；一旦落入修正主义手中，就会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五、当代全球革命实践中的马克思遗产：人民战争与反帝斗争的新高潮

今天，马克思的遗产在全球范围内继续闪耀光芒。印度、菲律宾、土耳其、秘鲁等国的毛主义游击队，坚持人民战争道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开展武装斗争；拉美、非洲的被压迫人民不断掀起反帝反修正主义浪潮；古巴群众在2026年莫隆事件中焚烧党部、喊出“自由”的声音，正是马克思所预言的“现代工人”觉醒的又一表现。

在AI技术革命、气候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新形势下，马列毛主义必须继续创新，但其根本原则——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绝不能动摇。只有坚持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继续革命理论，我们才能把分散的自发斗争汇合成埋葬帝国主义和一切修正主义的强大洪流。

总结：马克思遗产的继承关键在于创造性发展和反修斗争

马克思逝世143周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他的遗产只有通过列宁、毛主席的创造性发展，才能在当代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重建马列毛主义先锋队，深入批判当代各种修正主义（包括古巴式“卡斯特罗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自发的群众抗议提升为有领导、有纲领的政治革命。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告慰马克思：他的科学理论没有被埋葬，而是正在被千百万革命者掌握，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

结语：继承马克思遗志，投身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  
2026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逝世已经整整143周年。在这个帝国主义全面危机空前激化、修正主义政权纷纷暴露复辟本质的历史时刻，我们纪念马克思，不是为了进行形式上的追思，而是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前夜，重新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彻底清算当代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学说的系统歪曲，号召全球真正的革命者行动起来，重建无产阶级先锋队，投身于埋葬资本主义和一切修正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

143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永恒的真理性 and 强大的生命力。从《共产党宣言》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到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再到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历史飞跃，形成了当代的最高阶段——马列毛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为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今天，2026年的世界正处于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前夜。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达到了顶点，全球性经济停滞、通胀失控、战争阴云、生态灾难相互交织。古巴修正主义政权在2024-2026年陷入的持续能源危机、全国大停电、粮食短缺，以及2026年3月莫隆事件中群众自发冲入共产党党部、焚烧家具、高喊“¡Libertad！”的抗议浪潮，正是这一总危机的集中反映。它彻底戳穿了“和平过渡”“市场社会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等各种修正主义骗局，暴露了官僚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也再次印证了毛主席的科学论断：“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

回顾马克思的一生，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今天，我们继承马克思的遗志，就必须以同样的革命精神，投身于当前的阶级斗争实践。具体来说，就是要：

1. 彻底批判当代修正主义，清除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影响。必须系统揭露古巴“卡斯特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俄罗斯“主权民主”等新修正主义形式的反动本质，肃清其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把自发的经济抗议（如古巴的“cacerolazo”和莫隆暴力行动）提升为有马列毛主义理论指导的政治革命。
2. 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先锋队。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拉美、亚洲、非洲等革命条件相对成熟的地区，秘密建立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深入工厂、农村、大学和被压迫群众之中，开展群众路线工作，培养革命骨干，准备持久的人民战争。
3. 坚持继续革命，防止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在已经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或地区，必须坚决反对“市场改革”“混合经济”等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动群众开展“斗私批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4. 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把各国革命斗争汇合成世界革命的洪流。支持印度、菲律宾、土耳其等国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支持拉美和非洲人民的反帝反修正主义斗争，把古巴群众的自发反抗火种，培育成拉美乃至全球革命的燎原之势。

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它的垂死阶段，帝国主义战争、经济危机和生态灾难正在加速其灭亡。修正主义政权尽管暂时维持着“社会主义”的外壳，但其内在矛盾已无法调和，古巴2026年的危机不过是这一规律的又一次生动展现。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任何企图阻挡革命潮流的力量都将被碾得粉碎。

马克思逝世143周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让我们以马克思的名义，向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发出战斗号召：

在2026年这个帝国主义危机空前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日益成熟的时代，让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深入群众，重建先锋队，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彻底埋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光辉理想而奋斗到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Proletarios de todos los países, uníos!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打倒现代修正主义！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万岁！



# 修正主义对人民的战争

## 第一部分：引言

2026年3月17日起，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水口镇旺涌村及周边数百至数千劳动人民，因地方政府以“励儒大道”修路名义先行征地、暗中强推“信宜颐福园”火葬场项目（总投资1.45亿元，规划用地约5万平方米），自发聚集抗议，遭当地修正主义官僚机器调集大批防暴警察、特警乃至便衣，以盾牌、警棍、催泪枪乃至围殴手段进行血腥镇压，多名村民受伤、被捕，村庄遭封锁、停电，信息严密封锁。这一事件绝非孤立的“邻避”纠纷或单纯的环保争议，而是当代中国修正主义复辟下，官僚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人民群众实行赤裸裸资产阶级专政的又一血淋淋例证。它深刻暴露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已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地方政府成为资本积累和维稳的工具，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生存权和基本尊严遭到系统性践踏。

站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立场上，我们必须以反修正主义为锐利武器，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的阶级分析。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1975年指示）今日信宜的“先斩后奏”骗局——前期以修路名义征地，地基已建，3月16日才仓促公示火葬场，且谎称“中心半径500米无居民”（实际距旺涌村仅约700米、距小学约600米、紧邻水源地）——正是修正主义官僚集团惯用的阴谋诡计，是邓小平“猫论”实用主义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在基层的恶性延续。村民们合理的诉求——反对焚烧污染环境、威胁儿童健康、侵犯传统习俗与生活水源，以及要求公开透明决策——被粗暴打压，这充分证明，修正主义政权早已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压迫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实行“四大民主”，人民群众有权参与重大决策，有权监督干部；文革中更以“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今天，信宜村民手持国旗、喊出合理诉求，却遭遇盾牌阵、警棍雨和抓捕浪潮；一位白发苍苍的婆婆向警察投掷鸡蛋的画面，更成为人民群众英勇反抗的生动写照，却被污蔑为“寻衅滋事”。这鲜明对比揭示了路线斗争的实质：修正主义走资派复辟后，恢复了资产阶级法权，强化了官僚特权阶层对工农群众的剥削与镇压。火葬场项目表面是“公共设施”，实则服务于土地财政、殡葬产业化和资本扩张，置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文化心理于不顾，正是资本主义逻辑在“社会主义”旗号下的赤裸体现。信宜事件不是偶然，而是修正主义统治危机的必然产物。它与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征地纠纷、环保抗议、维权斗争一脉相承，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已将中国推向官僚资本主义深渊，广大工农群众重新沦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只有高举马列毛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反修防修，彻底否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修正主义谬论，

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信宜村民的自发反抗，虽带有局部性和自发性，却闪烁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火光。它警示一切真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将此类经济民生斗争提升为自觉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为最终埋葬修正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 第二部分（事件背景与事实还原）

2026年3月，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水口镇旺涌村及周边农村，再次上演了一出修正主义官僚集团欺骗与镇压劳动人民的活剧。事情的起因，表面上看是一项名为“信宜颐福园”的殡仪馆（火葬场）建设项目，官方于3月16日匆忙发布公示，宣称总投资1.45亿元，规划用地约5万平方米，建设周期10个月，选址位于市郊马六塘，谎称“中心半径500米无居民”。然而，广大村民很快发现，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骗局：项目实际距离旺涌村直线仅约700米，距离五胜村更近，距附近旺涌小学仅约600米，且紧邻村民日常生活水源地。焚烧尸体产生的废气、废水和二噁英等有毒物质，将直接威胁周边数千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儿童成长和农业生产。

更令人发指的是，前期征地过程完全是“暗度陈仓”的阴谋诡计。早在2024年起，当地政府就以修建“励儒大道”及周边道路的名义，大张旗鼓地征收土地，地基早已先行建成，村民们被蒙在鼓里，以为只是普通基础设施建设。直到公示发布，人民群众才如梦初醒：原来所谓“修路”不过是修正主义官僚为资本扩张服务的遮羞布，真实目的是强推殡葬设施产业化。这一“先斩后奏”的官僚主义作风，正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猫论”实用主义在基层的恶劣体现——只要能出政绩、搞土地财政、满足资本利益，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欺骗和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完全置毛主席“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于不顾。

从3月17日起，数百名旺涌村及周边村民自发聚集到村委，表达强烈不满。他们高举国旗，喊出“反对污染”“重新选址”“公开透明”“释放被捕群众”等合理诉求，试图通过合法渠道维护生存权和知情权。然而，修正主义政权迅速露出狰狞面目：大批防暴警察手持盾牌、警棍赶到现场，形成对峙。村民中不乏老人、妇女，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勇敢地走到前列，向警察投掷鸡蛋，这一画面迅速在民间流传，成为劳动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的生动象征，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喝彩与共鸣。

抗议迅速升级。3月18日至19日，更多村民（数百人规模）聚集到信宜市政府门前。警方出动上千警力，列成盾牌阵型阻挡，双方发生激烈肢体冲突。村民用鸡蛋、矿泉水瓶、石块等有限手段反击，而警察则挥舞警棍推搡、围殴，现场出现多人流血受伤、被抬离或直接抓捕的惨状。警方甚至出动水炮车、特警携带催泪弹进行威胁。冲突中，便衣警察混入人群“先抓带头人”，实行“杀鸡儆猴”的恐怖主义手段。

村庄周边道路被封锁，进出需查身份证，非本村人一律不得进入；附近多个村庄甚至出现长时间停电（早7点至晚10点），明显是为了切断信息传播、孤立抗议群众。

3月25日，公示期临近结束，抗议达到新高潮。约3000名村民不畏高压，再次聚集市中心淘金湾公园等地，和平表达诉求，要求撤回项目、释放被捕人员。警方依旧以高压维稳为主，广播警告、催泪枪威胁，冲突中再次出现抓捕和围殴。多名村民被以“寻衅滋事”等莫须有罪名行政拘留，至少十余人被带走。整个过程，现场视频和消息遭到严密封锁，村民在抖音等平台发布的求助信息迅速被删，外地亲属只能通过评论区接应呼吁关注。这一切，充分暴露了修正主义官僚机器的虚弱与残暴：他们害怕真相传播，害怕人民群众的团结觉醒，只能靠暴力、欺骗和信息控制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这一系列事实绝非“工作方法不当”或“个别干部作风问题”，而是当代中国修正主义复辟的必然产物。毛主席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深刻指出，农民群众的革命性是伟大的，他们一旦觉醒，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一切反动势力。今天信宜村民的自发抗议，正是这种革命精神的当代延续。他们反抗的不仅是火葬场带来的具体污染与不便，更是官僚资本主义对土地、环境和劳动人民生存权的系统性掠夺。修正主义走资派复辟后，恢复了资产阶级法权，干部蜕化成特权阶层，地方政府成为土地财政和资本利益的代理人。火葬场项目表面披着“公共设施”“规范殡葬”的外衣，实则服务于产业化、市场化逻辑，与毛主席时代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群众参与决策的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从来不是官僚包办，而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文革时期，人民群众通过“四大”民主，直接监督干部、参与重大事务，有效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今天，信宜事件的“先欺骗、后镇压”模式，正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彻底背叛。它提醒我们：只要修正主义路线不彻底否定，只要官僚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被砸烂，类似欺骗与镇压就会在全国各地反复上演——从征地拆迁到环保项目，从强制火葬到各种“发展”名义下的掠夺，广大工农群众始终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信宜事实的还原，不是为了单纯记录，而是为了服务于阶级分析。只有把这一事件放在马列毛主义反修防修的理论高度，才能看清其本质：它不是孤立的“邻避效应”，而是路线斗争在基层的尖锐表现；它不是“发展中的问题”，而是复辟倒退的必然结果。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批判和否定邓小平以来的修正主义谬论，才能真正解决此类矛盾，让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 第三部分（阶级本质分析）

信宜火葬场事件绝非一次单纯的“邻避”冲突或基层治理失误，而是当代中国修正主义复辟后，官僚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劳动人民实行赤裸裸阶级压迫的典型缩影。从马列毛主义和彻底的反修正主义立场出发，我们必须穿透表面现象，

直击事件的阶级本质：这是一个走资派官僚集团利用国家暴力工具，维护资本积累和特权统治，镇压人民群众正当反抗的活生生例证。

首先，这一事件暴露了修正主义政权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本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深刻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在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保护劳动人民、镇压剥削阶级的工具，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接受群众监督。文革更以“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为目标，防止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然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后，资产阶级法权全面恢复，官僚特权阶层重新形成，地方政府和警察系统彻底蜕变为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暴力工具。在信宜，村民们仅仅因为反对火葬场选址、要求知情权和重新选址，就遭到防暴警察的盾牌阵、警棍雨、催泪弹乃至便衣围殴。这充分证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已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专政、官僚资本主义专政。警察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走资派官僚和资本利益服务；“维稳”不是维护社会公平，而是维护修正主义统治秩序。毛主席早就警告：“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信宜事件，正是这一科学论断的又一次血淋淋验证。

其次，火葬场项目的推进，集中体现了修正主义路线下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逻辑。表面上看，“信宜颐福园”是一个“公共殡葬设施”项目，官方宣称旨在“规范殡葬管理、节约土地资源”。但在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下，这类项目从来不是为了人民，而是服务于土地财政、官商勾结和资本扩张。地方政府以“修路”名义先行征地，地基已建，再仓促公示，正是典型的“先斩后奏”、暗箱操作，置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于不顾。这种做法，与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形成鲜明对比。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统筹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必须发动群众讨论重大决策。而今日的修正主义官僚，却把土地当作商品，把人民群众当作可以随意牺牲的“成本”，把火葬场当作可以产业化赚钱的生意。焚烧设施紧邻村庄、学校和水源地，必然带来环境污染和健康危害，这不是“发展中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唯利是图逻辑在“社会主义”外衣下的必然结果。村民们反对的不仅是具体污染，更是官僚资本主义对农村土地的又一次掠夺，是对农民作为半无产阶级生存权的系统性侵犯。

再次，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看，这一事件暴露了修正主义对劳动人民精神世界的漠视与践踏。中国广大农村长期存在土葬等传统习俗，这些习俗虽有封建残余，但根植于劳动人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承载着文化心理和情感寄托。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始终坚持“破四旧、立四新”必须依靠群众自觉，而非官僚强迫。文革中，移风易俗是群众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今天，修正主义政权却以“现代化”“规范化”为名，强推火葬场选址，丝毫不顾及当地群众的心理忌讳和实际生活需求。这不是简单的“文化冲突”，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文化的粗暴压制，



是走资派用资本主义实用主义取代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结果。村民们在抗议中高举国旗、喊出合理诉求，甚至老人勇敢投掷鸡蛋，正是劳动人民在精神上对修正主义统治的英勇反抗。它证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群众一旦被逼到生存底线，就会爆发出巨大的革命潜力。

必须强调，信宜村民的抗议带有鲜明的革命性。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赞扬农民运动的伟大力量，指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的行动“其势如暴风骤雨”。今天信宜的数百至数千村民，从自发聚集村委，到多次冲击市政府，再到不畏催泪弹和抓捕坚持斗争，正是这种革命精神的当代延续。他们不是“刁民”，而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他们的诉求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对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正义反抗。修正主义走资派最害怕的，正是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团结。因此，他们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残酷镇压，封村、停电、抓人、删帖，妄图把斗争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再次证明：修正主义政权与人民群众是根本对立的，路线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当然，在进行阶级分析时，我们也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避免片面性。村民的诉求中确实包含传统习俗和环保等具体因素，这些都是合理的，必须给予支持。但马列毛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把这些具体矛盾上升到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高度，而不能停留在表面。自由资产阶级右派往往把此类事件歪曲为单纯的“人权”问题或“环保运动”，企图用改良主义麻痹群众，回避修正主义复辟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坚决批判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要警惕某些“左派”保党救国论者，他们回避彻底反修，幻想在现有体制内“改良”，实际上是在为走资派擦脂抹粉。只有彻底否定邓小平以来的修正主义路线，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征地欺骗、环境污染、官僚镇压等一系列问题。

信宜事件的阶级本质告诉我们：当代中国的根本矛盾，依然是走资派官僚资产阶级与广大工农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基层以各种形式尖锐爆发，征地纠纷、环保抗议、劳资冲突层出不穷，证明修正主义统治已陷入深刻危机。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只有坚持马列毛主义，坚持反修防修，坚持群众路线，把自发的经济斗争提升为自觉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才能最终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统治，重建社会主义制度，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 第四部分（多角度深入批判）

信宜火葬场事件绝不仅仅是一起地方性民生纠纷，而是修正主义复辟在中国基层社会造成的多重危机在特定时空下的集中爆发。从马列毛主义和彻底的反修正主义立场出发，我们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与国际等多个维度，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深刻的解剖，揭露其背后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暴露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腐朽与虚弱。

一、政治批判：阴谋诡计与法西斯化维稳的必然产物  
修正主义官僚集团在信宜事件中展现出的“先欺骗、后镇压”模式，是其一贯反动政治路线的典型表现。地方政府以“励儒大道”修路为名暗中征地，地基早已建成，却直到3月16日才仓促公示火葬场项目，且公然谎称“中心半径500米无居民”，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光明正大”“实事求是”原则。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而今日的走资派官僚却奉行阴谋诡计、欺上瞒下，把重大项目决策变成少数特权阶层和资本利益集团的私相授受，完全剥夺了劳动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当人民群众自发起来反抗时，修正主义政权立即露出法西斯化的狰狞面目：调集上千警力布设盾牌阵、动用催泪弹、水炮车、便衣抓捕，封锁村庄、切断电源、严密封锁信息。这不是简单的“维稳”，而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对人民群众的赤裸镇压。它证明，邓小平以来推行的“稳定压倒一切”路线，实质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毛主席在文革中强调“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人民群众直接监督干部、参与国家大事；而今日的修正主义统治却害怕群众、仇视群众，只能靠暴力机器和信息控制维持统治。这种政治上的倒退，正是修正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

二、经济批判：土地财政与官僚资本主义的血腥逻辑  
从经济根源看，火葬场项目的强推，是修正主义路线下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集中体现。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维持运转，把农村土地当作可以随意出让、变现的商品。所谓“公共殡葬设施”，表面披着“规范管理”“节约土地”的外衣，实则服务于殡葬产业化、市场化和资本扩张。1.45亿元的投资背后，很可能是官商勾结的利益输送链条：征地补偿低廉，项目建成后又可通过收费、关联产业实现利润。村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使用权，更是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和生活环境；他们反对的不仅是火葬场带来的污染，更是官僚资本主义对农民作为半无产阶级的又一次系统性掠夺。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必须统筹兼顾，不能只顾一头。而修正主义走资派复辟后，彻底抛弃了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把GDP增长和资本积累置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上。信宜事件再次证明：只要土地财政和官僚资本主义逻辑不改变，类似“以发展名义掠夺群众”的悲剧就会在全国农村和城市反复上演。农民失地后大量转化为廉价劳动力，进一步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廉价劳动力大军，这正是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在经济层面的残酷现实。

三、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对劳动人民精神世界的粗暴践踏

火葬场选址紧邻村庄和学校，不仅带来物理污染，更对当地劳动人民的传统文化心理造成严重冲击。中国广大农村长期形成的殡葬习俗，虽带有一定封建残余，但它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情感寄托和文化认同。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始终坚持移风易俗必须依靠群众自觉教育，而非官僚行政命令。文革时期“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正是通过发动群众、提高觉悟来实现的。

今日修正主义政权却以“现代化”为名，强行推进火葬设施，丝毫不顾及群众的心理忌讳和实际生活需求。这不是单纯的文化冲突，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压制，是用资本主义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取代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必然结果。村民在抗议中一位白发老婆婆投掷鸡蛋的英勇举动，正是劳动人民在精神上对这种文化压迫的强烈反抗。它证明：即使在修正主义统治下，人民群众的革命本能和文化尊严依然存在，一旦被逼到生存和情感底线，就会爆发出来。

四、历史联系与比较：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彻底背叛  
把信宜事件放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其反动性就更加清晰。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坚持群众路线，重大项目决策必须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讨论，依靠群众监督。文革更是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官僚主义作为核心任务，通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比之下，信宜的“先斩后奏”“欺骗征地”“暴力维稳”，正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面背叛，是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在当代的延续和恶性发展。

类似事件在全国层出不穷：从各地征地拆迁纠纷，到环保项目抗议，再到强制推行某些“发展”政策，都反映出修正主义统治下人民内部矛盾被激化、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普遍趋势。这绝不是“个别问题”，而是路线错误的必然产物。只有彻底否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修正主义谬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此类悲剧反复发生。

五、国际主义视角：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社会主义”旗号下的地方缩影

从国际视野看，信宜事件不是孤立的中国现象，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在修正主义中国这一特定形式下的表现。当代中国作为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已深度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内实行残酷剥削，对外进行资本输出，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火葬场项目所体现的土地掠夺、环境破坏和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与资本主义世界各地发生的“邻避”冲突、环境正义斗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修正主义政权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却实行最野蛮的资本主义剥削，这不仅欺骗了国内人民群众，也在国际上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认识到中国修正主义统治的危机，是全球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反对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才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贡献。

在进行多角度批判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各种错误倾向。右倾机会主义者会把事件歪曲为单纯的“人权”或“环保”问题，企图用资产阶级民主改良麻痹群众；某些假左派则回避彻底反修，幻想在现有体制内“改良”或“保党救国”，实际上是在为走资派维持统治效力。我们必须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彻底性，既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也反对“左”倾空谈主义，只有把经济斗争提升为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才能真正解决根本问题。

信宜事件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国际多个角度，全面暴露了修正主义统治的反动性、腐朽性和虚弱性。它再次证明：只要修正主义路线不被彻底否定，官僚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被砸烂，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就不会结束。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反修防修，坚持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才能迎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复兴。

第五部分（革命意义与群众路线启示）

信宜火葬场事件，虽然以人民群众的局部反抗暂时被修正主义暴力机器所压制而告一段落，但其革命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它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当代中国修正主义复辟条件下，广大工农群众自发觉醒与反抗的又一次重要实践。从马列毛主义和彻底的反修正主义立场出发，我们必须科学总结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把自发的经济民生斗争提升到自觉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为未来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积累力量。

首先，信宜村民的抗议行动具有鲜明的革命进步性。2026年3月17日以来，从旺埔村村委到信宜市政府门前，再到3月25日数千人聚集市中心，数百至数千劳动人民不畏防暴警察的盾牌、警棍、催泪弹和抓捕，高举国旗，喊出“反对污染”“重新选址”“释放被捕群众”等口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勇敢投掷鸡蛋的英勇画面，更成为人民群众不屈精神的生动写照。这一切，充分体现了被压迫劳动人民的革命本能和斗争意志。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评价农民群众：“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今天信宜的农民和半无产阶级，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冲决修正主义官僚统治的罗网，朝着反抗资产阶级专政的方向迅跑。尽管他们的斗争还带有自发性、局部性和经济诉求为主的特点，但这种自发反抗本身，就是对修正主义“稳定压倒一切”谎言的沉重打击，是对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质疑。它打破了“中国老百姓只求温饱、不敢反抗”的改良主义迷梦，证明即使在高压维稳之下，人民群众的革命火种依然在燃烧，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其次，这一事件深刻暴露了自发斗争的局限性，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群众路线启示。信宜村民的抗议虽然英勇，但由于缺乏系统的马列毛主义理论指导，未能及时把具体经济诉求（反对火葬场污染、要求重新选址）上升到对整个修正主义路线和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因此容易被孤立、分割和镇压。

修正主义政权正是抓住这一弱点，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残酷打击：封村、停电、抓捕、删帖，把斗争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再次证明，单靠自发的经济斗争，没有先进理论的武装，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斗争就难以持久、难以扩大、难以取得根本胜利。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只有把马列毛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交给群众，把自发的斗争提高到自觉的路线斗争水平，才能真正战胜强大的敌人。

正确的道路，必然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信宜事件中，如果有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深入到村民中间，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他们把反对火葬场选址的具体斗争，同全国范围内征地欺骗、环境破坏、官僚镇压等普遍现象联系起来，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复辟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同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历史任务联系起来，那么这场斗争就可能突破局部局限，发展成为更有组织、更具政治觉悟的群众运动。真正的革命者应当学习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和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形式，在斗争中逐步建立起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培养骨干，团结最广大劳动人民，逐步形成能够领导斗争的核心力量。只有这样，自发的抗议才能转化为自觉的革命斗争，局部的火光才能汇聚成燎原的革命烈火。

信宜事件的启示还在于：修正主义统治的危机正在不断加深。此类基层抗议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从征地拆迁到环保纠纷，从强制推行某些“发展”项目到劳资冲突，都反映出官僚资本主义与广大工农群众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日益尖锐。修正主义走资派越是依赖暴力维稳，就越暴露其统治的虚弱；他们越是害怕真相传播，就越证明人民群众一旦觉醒，就具有摧毁旧世界的巨大潜力。这些自发斗争虽然暂时被镇压，但每一次镇压都进一步教育了群众，使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认清修正主义政权的反动本质，为未来革命积累了宝贵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经验。

当然，在总结革命意义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辩证分析。既要充分肯定信宜村民反抗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坚决支持他们的合理诉求；又要指出自发斗争的局限，避免陷入“自发论”或“经济主义”的右倾错误。同时，也要警惕某些假左派把此类事件仅仅当作“维权”案例，回避彻底反修防修的根本任务，或者幻想在现有体制内通过“上访”“改良”解决问题。马列毛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把一切局部斗争都纳入反对修正主义、重建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之中。只有彻底否定邓小平以来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倒走资派官僚集团，砸烂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宜这类事件所反映的深层矛盾，让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不再遭受欺骗、掠夺和镇压。

信宜事件虽然只是全国亿万劳动人民苦难中的一例，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修正主义统治的腐朽，照亮了革命斗争的方向。它告诉我们：广大工农群众才是真正的革命主力军，是埋葬修正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只要我们高举马列毛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反修防修，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自发的反抗逐步引导到自觉的革命轨道上来，那么，修正主义统治的末日就必将到来，社会主义的春天就必将重返中国大地。

第六部分（结论：号召行动与历史展望）

信宜火葬场事件，以人民群众的英勇反抗和修正主义暴力机器的残酷镇压，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出路。从马列毛主义和彻底的反修正主义立场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事件绝非孤立的“基层纠纷”，而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复辟以来，官僚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对抗性矛盾的一次尖锐爆发。它再次雄辩地证明，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已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地方政府和警察系统彻底沦为走资派官僚集团维护资本积累、镇压人民群众的工具。只有彻底否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修正主义谬论，打倒走资派，砸烂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宜这类事件所暴露的欺骗征地、环境破坏、官僚镇压等一系列深层问题，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历史和现实都反复告诉我们：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走资派掌权，就是劳动人民重新遭受剥削和压迫。毛主席早在1975年就严肃指出：“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今天信宜村民“先被骗、后被打”的遭遇，正是对这一伟大教导的血淋淋验证。火葬场项目“先斩后奏”的阴谋诡计、暴力维稳的法西斯手段，以及对人民群众知情权、生存权和文化尊严的粗暴践踏，无一不是修正主义路线反动本质的集中体现。信宜事件与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征地抗议、环保斗争、劳资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修正主义统治危机的生动写照。它警示一切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修正主义路线不被彻底清算，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不被推翻，广大工农群众的苦难就不会结束，类似悲剧就会在全国反复上演。但是，修正主义统治的危机，同时也孕育着革命的希望。毛主席教导我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宜村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的精神，正是新时期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它虽然暂时被高压维稳所压制，但每一次镇压都进一步教育了群众，使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认清了修正主义政权的反动面目，积累了宝贵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经验。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巴黎公社的失败孕育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土地革命的挫折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文革的暂时受挫也必将为未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复兴奠定基础。今天，全国各地自发的群众斗争正在不断涌现，只要我们坚持马列毛主义，



坚持反修防修，坚持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把自发的经济斗争逐步提升为自觉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那么，这些星星之火就一定能够汇聚成燎原的革命烈火，最终埋葬修正主义，重建社会主义。

当前，一切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面临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要勇于深入工厂、农村、街道，走到工农群众中间去，虚心向群众学习，认真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群众把局部诉求同整个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联系起来，在斗争中逐步建立起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革命群众组织，培养骨干力量，团结最广大被压迫劳动人民。只有这样，才能把信宜这类自发反抗，转化为有组织、有觉悟、有领导的革命运动，为最终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实现无产阶级重新掌权奠定坚实基础。

展望未来，我们充满必胜的信心。修正主义统治看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它越是依赖暴力镇压和信息封锁，就越暴露其虚弱和恐慌；它越是害怕人民群众的觉醒，就越证明劳动人民是埋葬旧世界的决定性力量。毛主席早就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修正主义走资派终究逃脱不了被历史淘汰的命运，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必将在中国 and 全世界胜利。信宜事件虽然只是亿万劳动人民斗争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却照亮了革命的方向。它号召我们：高举马列毛主义伟大红旗，坚持反修防修，坚持群众路线，继承文革的革命精神，勇敢地投入到反对修正主义、重建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去！

让我们以信宜村民的英勇反抗为榜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下，团结起来，战斗起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指引革命！打倒修正主义！打倒走资派！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



# 庆祝菲共新人民军成立57周年：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学习持久人民战争的革命经验

第一段（引言部分）

2026年3月29日，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NPA）迎来了光辉的57周年诞辰！从1969年3月29日在塔拉克省以60名革命战士起家，到今天已发展成为一支坚持马列毛主义指导、开展持久人民战争的强大革命武装力量，NPA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菲律宾土地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英勇打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谱写了当代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壮丽篇章。这一57年的战斗历程，是马列毛主义在东南亚的生动实践，是对一切现代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和平过渡”谬论的有力批判。它雄辩地证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要坚持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弱小的革命力量就一定能够战胜貌似强大的敌人，在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

站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立场上，我们必须以彻底的反修正主义精神，热烈庆祝NPA的57周年华诞。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菲共（CPP）和NPA的诞生与发展，正是对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和菲律宾旧共产党（PKP）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彻底决裂。何塞·马里亚·西松（Amado Guerrero）等革命先驱在1968年重建菲共时，就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开展第一次大整风运动，批判老修正主义领导，确立了“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路线。NPA作为菲共的主要武装力量，从成立之初就坚决贯彻党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人民军队和革命统一战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这与邓小平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背叛世界革命的叛徒行径，形成鲜明对比。今天，当中国已蜕变为官僚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之时，NPA却在美帝及其菲律宾傀儡政权的残酷围剿下，坚持斗争57年不倒，这本身就是对修正主义“和平演变”“议会道路”幻想的最有力驳斥。

NPA的57年斗争史，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光芒。它不仅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和经济掠夺，动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秩序，更为全球被压迫人民提供了宝贵的革命经验：如何在帝国主义时代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如何在复杂环境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群众路线，如何把自发的农民反抗提升为自觉的人民战争。当前，菲律宾广大工农群众仍遭受美帝和本地买办政权的残酷剥削，土地集中、贫困失业、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尖锐，而NPA的持续发展，正是人民群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本能的体现。它警示一切真马克思主义者：在修正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以及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中，唯有学习NPA的彻底反修精神、群众路线和武装斗争经验，

才能打破改良主义迷梦，重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

庆祝NPA成立57周年，不是简单的纪念，而是为了从其斗争实践中汲取力量，运用于当代革命。让我们以这篇战斗檄文为起点，深入学习菲共NPA的宝贵经验，高举马列毛主义伟大红旗，坚持反修防修，坚持人民战争道路，为埋葬一切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争取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而英勇奋斗！

第二部分（历史背景与建军历程）

菲共新人民军（NPA）的诞生，是菲律宾革命史上一次伟大的反修正主义胜利，是马列毛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功运用的光辉范例。1968年12月26日，在何塞·马里亚·西松（化名Amado Guerrero）等革命者的领导下，菲律宾共产党（CPP）实现了重建，彻底批判并决裂了旧共产党（PKP）长期奉行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正确政治路线。仅仅三个月后，1969年3月29日，NPA在塔拉克省正式宣告成立，最初仅由60名革命战士组成，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决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建军日期，是为了纪念菲律宾人民反日斗争中Hukbalahap游击队的英勇精神，象征着革命武装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崛起。NPA的成立绝非偶然，而是菲律宾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修斗争的必然产物。当时的菲律宾，仍处于美帝国主义及其本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之下，广大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掠夺，城市工人阶级同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旧PKP领导集团长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迷信“议会道路”、放弃武装斗争，实质上充当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帮凶。西松等革命者以马列毛主义为武器，开展了深刻的整风运动，批判了老修正主义的投降主义，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著作，明确提出在菲律宾必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持久人民战争推翻三座大山。

这一过程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反修防修斗争一脉相承。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始终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菲共重建和NPA建军，正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他们坚决反对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鼓吹的“和平过渡”和“三和一少”路线，拒绝把革命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善意”或议会选举之上，而是毅然拿起武器，建立人民军队，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道路。从成立之初，NPA就贯彻菲共的“三大法宝”——党的领导、人民军队和革命统一战线，深入农村，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形成了“鱼水关系”的军民团结。



初期斗争是极其艰苦的。面对美帝支持的菲律宾反动军队的多次“围剿”，NPA坚持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灵活机动方针，从小规模武装宣传队起步，逐步发展壮大。他们不怕牺牲，不畏强敌，在山区和农村建立起一个个红色根据地，开展政治教育、减租减息和武装自卫，真正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这一切，充分体现了马列毛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只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和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即使革命力量最初弱小，也能像“星星之火”一样，最终形成“燎原”之势。

对比中国修正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NPA的建军历程更显珍贵。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在中国上台后，抛弃毛泽东思想，复辟资本主义，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外背叛世界革命，而菲共和NPA却在同一历史时期，高举反修旗帜，坚持武装斗争57年不倒。这鲜明地证明：修正主义是革命的死敌，只有彻底反修防修，才能保证革命事业不被断送。NPA从60人发展到今天仍能在全中国多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始终依靠最广大被压迫群众。

学习NPA的建军经验，对于今天仍处于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中国革命者，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告诉我们：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必须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入手；建立革命武装，必须从农村和基层群众工作做起；开展斗争，必须坚决反对“和平改良”和“议会迷”的右倾机会主义幻想。只有像菲共和NPA那样，敢于同一切修正主义决裂，敢于拿起枪杆子，敢于发动群众，才能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重重包围中，开辟出一条通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 第三部分（57年斗争成就与经验总结）

57年来，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NPA）在菲共正确领导下，高举马列毛主义伟大红旗，以持久人民战争为战略总方针，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开展武装革命的辉煌成就，积累了极其宝贵的革命经验。这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坚持毛泽东思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生动实践。它雄辩地证明：毛主席人民战争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就一定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首先，在军事斗争方面，NPA坚持并发展了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创造了适应菲律宾国情的丰富经验。面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菲律宾傀儡政权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清剿”和“绥靖”计划，NPA始终贯彻“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采取高度分散与适度集中的灵活战术，在广大农村和山区建立起一个个革命根据地。他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同时广泛开展武装宣传、群众工作和政治攻势。57年来，NPA先后粉碎了马科斯独裁政权、阿基诺家族政权、杜特尔特法西斯统治以及当前买办政府的多次大规模军事进攻，保存并发展了革命力量。这一切，充分验证了毛主席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科学论断：反动派表面强大，实则外强中干；革命人民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以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大炮。

其次，在群众路线和根据地建设上，NPA创造了依靠农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的成功范例。他们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满足广大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从而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NPA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而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宣传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他们帮助农民组织农会、建立红色政权，开展识字教育、政治培训和互助合作，在根据地内初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真正做到了“军民鱼水情”。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NPA正是因为始终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根本工作方法，才能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与修正主义政党脱离群众、官僚化、特权化的丑恶面目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三，在统一战线策略上，NPA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下广泛的广泛团结。他们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本地走狗，同时坚决防止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农村，他们团结中农和开明士绅；在城市，他们支持工人罢工、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爱国斗争；在国际上，他们积极开展反帝国际主义工作。这一切，都服务于壮大革命力量、孤立主要敌人的战略目标。57年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统一战线才能成为革命的“法宝”，而不是变成机会主义者出卖革命的工具。

第四，从阶级本质和路线高度看，NPA 57年的斗争，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道路的彻底坚持。他们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坚决批判“和平过渡”“议会道路”“民族和解”等修正主义谬论。无论面临多么残酷的镇压、内部右倾分裂还是外部帝国主义干涉，NPA始终保持革命的坚定性和纯洁性，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正是对邓小平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抛弃世界革命的最有力回击。今天，当中国已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压迫工农群众、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之时，NPA却在菲律宾继续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这本身就是对一切背叛革命者的无声批判。

NPA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坚持马列毛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和持久人民战争。这些经验不是书本上的教条，而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真理。它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只能通过彻底的革命暴力来实现，而绝不能寄希望于帝国主义的“恩赐”或修正主义的“改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NPA从60人发展到今天仍能在全中国多个岛屿坚持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正是这一伟大真理的活生生证明。

57年的光辉历程，充分展现了马列毛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它不仅为菲律宾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斗争武器。学习NPA的斗争经验，就是要学习他们彻底的反修正主义精神、坚定的群众观点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修正主义统治复辟的黑暗时期，点燃革命的火种，积蓄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 第四部分（当代意义与多角度批判）

菲共新人民军57年的英勇斗争，不仅是菲律宾革命的宝贵财富，更具有重大的当代国际意义。它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双重围攻之下，坚持马列毛主义指导、开展持久人民战争的实践，犹如一面鲜艳的红旗，照亮了全球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道路，同时也对一切现代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进行了深刻而有力的批判。

从政治角度看，NPA的持续存在和战斗，彻底戳穿了菲律宾历届买办傀儡政权所鼓吹的“民主”“法治”“和平发展”等谎言。无论是在马科斯独裁时期，还是在所谓“民主”政府统治下，反动政权都以“反恐”“绥靖”为名，对NPA和革命群众实施残酷镇压，使用美式武器、情报系统和法西斯手段，妄图消灭革命力量。然而，NPA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证明了资产阶级专政的虚弱性和人民战争的强大生命力。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NPA57年坚持武装斗争，正是对这一真理的忠实实践。它雄辩地告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绝不能把解放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议会、选举或“和谈”之上，那不过是修正主义者麻痹群众、维护反动统治的骗局。只有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工农政权，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从经济角度看，NPA在根据地开展的土地革命和群众工作，直接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剥削体系。他们帮助农民夺回被地主霸占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自救，初步改善了根据地群众的生活条件。这与菲律宾全国范围内土地高度集中、农民赤贫、城市工人遭受超额剥削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今天，菲律宾仍是美帝国主义重要的原料产地和投资市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通过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帝国主义支持，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而NPA的土地革命实践，恰恰证明了只有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真正解决土地问题，为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这也是对当代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土地财政模式的有力批判——在中国，修正主义走资派同样以“发展”名义掠夺农民土地，服务于资本积累，与菲律宾买办政权本质上同属一个反动阵营。

从文化与意识形态角度看，NPA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开展广泛的政治教育，批判封建迷信、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修正主义投降思想。他们在根据地建立夜校、宣传队，用革命歌曲、戏剧和通俗读物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破除“宿命论”和“改良幻想”。这一实践再次证明：革命不仅要改变生产关系，还要改造人的灵魂。修正主义者总是鼓吹“经济决定一切”“和平建设优先”，实质上是放弃思想战线的斗争，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腐蚀革命队伍。

而NPA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马列毛主义真正交给群众，才能筑起反对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精神长城。

从国际主义视角来看，NPA的斗争是对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直接打击。菲律宾作为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重要军事据点和经济附庸，NPA的反帝武装斗争，动摇了美帝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它与历史上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尼泊尔人民战争等实践一道，构成了当代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痛心的是，当今中国修正主义政权早已背叛了毛主席的国际主义路线，对菲律宾革命采取冷漠甚至阻挠的态度，优先发展与菲律宾买办政府的经济关系，这充分暴露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大国沙文主义本质。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坚决批判这种背叛，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全力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不是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同流合污。

把NPA的当代意义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联系中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对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修防修经验的继承和发展。苏联修正主义上台导致红色政权变色，中国邓小平集团复辟资本主义，使世界革命暂时陷入低潮。但NPA却在这一低潮中高举红旗，坚持斗争57年不倒，这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过时论”的有力回击。它同时警示我们：在修正主义统治复辟的国家（如当代中国），革命者必须吸取教训，坚决反对“保党救国”“和平改良”等右倾机会主义幻想，敢于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敢于重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当然，在肯定NPA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清醒认识革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菲律宾反动政权的法西斯镇压、以及革命队伍内部可能出现的右倾动摇，都要求NPA继续加强党的建设、纯洁队伍、提高警惕。但这些困难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对胜利的信心。历史早已证明：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是觉醒的人民群众。只要坚持马列毛主义指导，坚持群众路线和持久人民战争，菲律宾革命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最后胜利。

NPA57年的当代意义，正在于它为全世界一切真诚的革命者提供了一面镜子：镜子里映照出修正主义统治的腐朽与虚弱，也映照出马列毛主义不朽的光芒。它号召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低潮中准备高潮，在压迫中积蓄反抗的力量。

#### 第五部分（革命号召与学习经验）

菲共新人民军57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全世界马列毛主义者、革命群众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它以铁的事实证明：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统治的时代，只要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彻底的反修正主义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和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就一定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战胜貌似强大的敌人。今天，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深化和修正主义统治复辟的严峻现实，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创造性地运用NPA的宝贵斗争经验，把自发的反抗提升为自觉的革命运动，为埋葬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

首先，必须学习NPA彻底的反修正主义精神。NPA的诞生本身就是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决裂。他们在建党初期就开展了深刻的思想整风，批判旧PKP的右倾机会主义和苏联赫鲁晓夫路线的投降主义，坚决拒绝“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和“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谬论。57年来，无论面临多么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右倾动摇，NPA始终保持革命的纯洁性和坚定性，从不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妥协。这对今天仍处于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中国革命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抛弃世界革命之后，许多人陷入悲观失望或改良幻想。而NPA的经验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只有像菲共和NPA那样，敢于同一切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决裂，敢于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才能重新点燃革命的火种。当前，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保党救国”“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各种右倾机会主义谬论，坚持“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的原则，把批判修正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首要任务。

其次，必须学习NPA坚定不移的群众路线和根据地建设经验。NPA之所以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始终把根扎在最广大被压迫群众之中，特别是贫苦农民之中。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是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队、宣传队和战斗队，通过土地革命、减租减息和政治教育，把农民的切身利益与整个革命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军民鱼水情”的牢固关系。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NPA正是这一教导的忠实实践者。今天，在中国广大农村和城市，征地掠夺、环境破坏、劳资矛盾等自发斗争（如信宜火葬场事件）层出不穷，但许多斗争仍停留在局部经济诉求层面，容易被修正主义暴力机器所孤立和镇压。学习NPA，就是要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发动最底层工农群众，把经济民生斗争逐步提升为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在斗争中建立革命的群众组织和红色根据地，为持久人民战争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必须学习NPA掌握“三大法宝”、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艺术。NPA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确保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坚持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牢牢掌握无产阶级领导权；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有机统一，构成了菲律宾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要特别警惕“左”倾空谈和右倾投降两种错误倾向，既要反对脱离实际的盲动主义，也要反对放弃武装斗争的投降主义。只有像NPA那样，敢于拿起枪杆子，敢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敢于把自发抗议转化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持久人民战争，才能真正打破修正主义统治的枷锁。

第四，必须学习NPA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国际主义的革命作风。他们在长期斗争中，不依赖外部援助，不迷信“和平谈判”，

而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克服了无数物质困难，保持了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作风。同时，NPA始终把菲律宾革命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全局之中，积极支援和声援各国人民的斗争。这与当今中国修正主义政权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世界革命的背叛形成了鲜明对照。学习NPA，就是要树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观念，在本国革命实践中自觉贡献于世界革命事业。

当前，中国正处于修正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黑暗时期，工农群众的苦难日益加深，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信宜火葬场事件等一系列基层抗议，正是人民群众革命觉醒的萌芽。NPA57年的经验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只有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重建真正的革命政党，深入群众，开展持久人民战争，才能把这些星星之火汇聚成燎原之势。让我们以NPA为榜样，勇敢地投入到反对修正主义、重建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去！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认真学习菲共新人民军57年的斗争经验，把毛泽东思想真正掌握在手中，运用于本国革命实践！坚决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菲律宾革命的最终胜利，为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高潮，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到底！

第六部分（结论：展望胜利与战斗动员）

同志们，革命者们！

2026年3月29日，菲共新人民军成立57周年的光辉日子，再一次向全世界宣告：马列毛主义没有过时，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没有过时，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没有过时！57年来，NPA在菲律宾的崇山峻岭和广大农村，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壮丽史诗。他们从60名战士起步，发展成为一支坚持毛泽东思想、打击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强大革命力量，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粉碎一次又一次反革命“围剿”，这本身就是对一切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和“社会主义失败论”的最有力回击。它雄辩地证明：只要高举马列毛主义伟大红旗，坚持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武装斗争，革命的星星之火就一定能够燎原，弱小的人民军队就一定能够战胜貌似强大的纸老虎。

今天，当中国已彻底蜕变为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走资派集团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外背叛世界革命之时，NPA的57年斗争犹如一面鲜红的战旗，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就是把劳动人民重新推入火坑；只有彻底反修防修，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信宜火葬场事件等一系列基层抗议，正是人民群众在修正主义高压下自发觉醒的萌芽，而NPA的经验为我们指明了把这些自发斗争提升为自觉人民战争的正确道路。

展望未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菲律宾革命必将胜利，中国革命必将重新爆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高潮必将到来！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都只不过是纸老虎，它们终究逃脱不了被历史埋葬的命运。让我们以NPA57周年为新的起点，行动起来！

高举马列毛主义伟大红旗，认真学习菲共新人民军的宝贵经验——彻底的反修正主义精神、坚定的群众路线、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

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到最广大工农群众中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把经济民生斗争提升为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

坚决反对一切修正主义谬论，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掌握“三大法宝”，敢于拿起枪杆子，开展持久人民战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

菲共新人民军万岁！菲律宾共产党万岁！马列毛主义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定胜利！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万岁！



# 论315-一场官僚资本的狂欢

引言

2026年“3·15”——官僚资本主义敲诈人民群众的盛宴总爆发

2026年3月15日，第44个“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如期而至。央视“3·15晚会”照例以“提升消费品质”为主题，曝光了漂白鸡爪（工业双氧水处理）、外泌体三无医美产品、增高机构骗局、AI大模型“投毒”、租赁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荐股诈骗等七大消费乱象。表面上看，这是一场“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年度大戏；然而，从马列毛主义科学立场出发，这绝不是什么维权盛会，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敲诈的盛宴，一场官僚资本主义的盛宴。

当代中国修正主义政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实行的官僚资本主义），在经济下行、通胀加剧、群众不满日益积累的压力下，精心导演了这场年度表演。工业双氧水漂白的鸡爪被端上底层工农的餐桌，三无医美产品被包装成“万能神药”割中产和青少年的韭菜，垄断平台与AI资本联手制造新的数字敲诈……这一切乱象的根源，不在于“个别企业道德缺失”或“监管一时疏忽”，而在于党官僚与垄断资本的联合专政下，生产关系已全面复辟为资本主义。广大工农群众早已不再是国家的主人，而是被敲诈、被毒害、被收割的新剩余价值来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积累。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若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内走资派就会蜕变为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外壳下必然复辟资本主义。2026年“3·15”正是这一铁律在消费领域的血淋淋总暴露。它与古巴2024-2026年能源危机中群众焚烧党部的抗议浪潮一样，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自发表达，却被修正主义政权包装成“个案整治秀”，迅速转移视线、平息愤怒，继续维持其敲诈盛宴的运转。

坚持马列毛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必须对这场“3·15”进行彻底的阶级分析。所谓“提升消费品质”的全国年主题，不过是官僚资本主义在“高质量发展”骗局下的最新遮羞布；央视晚会“曝光—整治—宣传”的固定模式，不过是国家机器保护垄断资本、继续敲诈人民群众的仪式化表演。我们既要看到晚会曝光在客观上带来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也要坚决揭露其不触及制度根源的欺骗本质：它从来不触动党官僚与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从来不发动群众进行真正的继续革命，从来不从路线高度批判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

今天纪念马克思逝世143周年，我们绝不能把纪念变成温情脉脉的学术缅怀，而必须把它变成一场彻底的反修战斗员。2026年“3·15”这场敲诈盛宴，再次证明了“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的科学论断。

它告诉我们：只有彻底砸烂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机器，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先锋队，领导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第二次革命，才能结束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剥削盛宴，实现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消费关系。

这场盛宴必须被揭露，这场盛宴必须被砸烂！

历史蜕变：从社会主义消费保障到修正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敲诈盛宴复辟

2026年“3·15”这场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盛宴，绝非一夜之间突然出现，而是中国修正主义政权长期和平演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面复辟的历史必然结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消费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到1978年后修正主义路线主导下的市场化转型，再到今天以“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为名继续上演的敲诈盛宴，这一历史蜕变过程，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资本主义就会通过和平方式复辟，人民群众就会从国家主人重新沦为被敲诈、被剥削的对象。

一、1949-1976年：社会主义消费保障的进步性与内在缺陷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和政府逐步建立起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消费保障体系。粮食统购统销、基本生活资料按需供应、医疗教育低收费或免费、工业产品优先满足人民需要……这些措施虽然在当时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仍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消费权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这是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被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三重敲诈的根本否定，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这一时期也存在内在缺陷。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经验不足，消费领域的群众监督机制尚未充分建立，官僚主义作风在部分环节已有萌芽，未能通过持续的文化大革命式群众运动彻底清除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就为后来修正主义路线篡权复辟留下了可乘之机。

二、1978年后改革开放：修正主义路线主导下的敲诈盛宴序幕

1978年，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后，公开抛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推行所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费领域首当其冲地发生了质的蜕变：从“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计划供应，迅速转向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流通。

外资大量涌入，国有企业被“改制”成为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的工具，民营垄断资本迅速崛起。曾经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消费资料生产，变成了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敲诈机器。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医疗教育商品化……这一切，正是官僚资本主义敲诈盛宴正式拉开帷幕的标志。

这一时期，党内的走资派与新兴资产阶级相互勾结，通过价格双轨制、土地财政、股市圈钱等手段，完成了对国有资产和人民群众财富的第一次大规模掠夺。消费领域不再是满足人民需要的环节，而是资本实现剩余价值、官僚特权阶层享乐消费的新战场。

三、2000年代至今：“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骗局下的敲诈盛宴升级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修正主义政权打出“科学发展观”“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双循环”等一系列新口号，试图给官僚资本主义披上更加“现代化”的外衣。但实质上，这不过是敲诈盛宴的升级版和精致化。

消费领域被全面推向市场化和数字化：平台垄断资本（阿里、腾讯、字节等）与党官僚深度融合，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医美、保健、数字娱乐等新兴消费被包装成“品质生活”，实则成为割韭菜的新工具；食品安全监管长期形同虚设，漂白鸡爪、毒奶粉、地沟油等顽疾年年反复，正是因为整个生产流通链条已彻底服从于官僚资本的利润逻辑。

2026年“3·15”提出的“提升消费品质”主题，正是这一敲诈盛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的最新表演。它一边高喊“放心消费”，一边继续放任工业双氧水漂白鸡爪进入市场，继续允许三无医美产品和AI投毒式诈骗肆虐，目的只有一个：维持官僚资本的超额利润，平息群众日益高涨的不满，继续敲诈广大工农和中下层群众的血汗钱。

#### 四、历史教训与边缘分析

143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70多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反复证明：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如果不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开展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外壳就会迅速被修正主义蛀空，最终复辟为官僚资本主义。古巴从1959年革命到2026年莫隆抗议的蜕变，与中国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今天“3·15”敲诈盛宴的历程，完全是同一条修正主义复辟道路的不同表现形式。

部分“左派”或“小粉红”至今仍幻想“中国模式”有某种“优越性”，认为“至少比西方好”。但2026年漂白鸡爪等乱象再次无情戳穿这一谎言：在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消费领域已彻底成为敲诈人民群众的盛宴，毒食品、假医疗、数字割韭菜……每一次“3·15”的曝光，都不过是这场盛宴暂时掀开的一角桌布，盛宴本身从未停止。

只有坚持马列毛主义，只有重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有发动群众进行继续革命，才能从根本上结束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官僚资本主义敲诈盛宴。

理论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在消费领域的三大敲诈机制

2026年“3·15”这场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盛宴，并非偶然的“监管漏洞”或“企业失德”，

而是当代中国修正主义政权在消费领域系统推行“市场社会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这一路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外衣，实质上是党官僚与垄断资本紧密勾结，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剩余价值掠夺。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2026年“3·15”暴露的漂白鸡爪、外泌体三无产品、AI投毒等乱象，正是这一主要危险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体现。它通过三大敲诈机制，维持着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继续革命与群众路线、背叛世界革命与国际主义。

一、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把消费维权变成保护垄断资本的敲诈工具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使国家真正成为劳动人民镇压剥削者的工具。而在今日中国，消费领域的“维权”已被彻底异化。所谓“3·15晚会”“12315平台”“全国消协智慧315”，表面是维护消费者权益，实质上是党官僚和国家机器为垄断资本保驾护航的敲诈工具。

2026年晚会曝光的工业双氧水漂白鸡爪、外泌体三无医美产品等乱象，根源在于生产、流通、监管全链条已被官僚资本控制。党官僚通过国有资本和平台垄断资本的深度融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一方面允许资本为追求超额利润而生产毒食品、假医疗，另一方面又在“3·15”这一天通过有限曝光进行“表演式维权”，既收割了群众的愤怒情绪，又保护了垄断资本的核心利益。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应当由工农群众直接监督生产和消费，而今日的“维权”却由官僚机构垄断，群众只能被动地等待“曝光”和“整治”。这正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彻底背叛，是官僚资本主义敲诈盛宴得以长期维持的制度基础。

二、背叛继续革命与群众路线：把群众自发斗争“个案化”、仪式化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通过群众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来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而，修正主义政权完全抛弃了这一科学理论，转而推行官僚化的“维权”机制。

2026年“3·15”晚会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顽疾、数字敲诈）简化为“个别企业”或“技术问题”，迅速通过“连夜部署”“专项整治”将其“个案化”。这种做法的本质，是拒绝发动群众进行路线斗争，拒绝从生产关系高度批判官僚资本主义。群众自发的愤怒（对毒鸡爪、对三无医美的痛斥）被引导到“举报”“投诉”“等待官方处理”的框架内，最终被消耗、被平息。真正的群众路线应当是让工农群众直接参与生产监督、消费监督和政权监督，而今日的“3·15”却把群众变成旁观者和“被维权”的对象，进一步巩固了官僚资本的敲诈秩序。

这与古巴修正主义政权在2026年莫隆事件后通过“亲政府游行”和“释放囚犯”转移群众不满的手法如出一辙，都是新修正主义国际共同的维稳骗局。

三、背叛世界革命与国际主义：输出“市场社会主义”敲诈模式，融入全球资本链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核心原则。真正的国际主义要求支持全球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剥削。

而今日中国修正主义政权，却把消费领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输出到全球，与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等当代修正主义政权形成了一个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新修正主义国际”。2026年“3·15”暴露的AI投毒、平台经济敲诈等新兴乱象，正是中国修正主义深度融入全球垄断资本链条的体现。它一边在国内推行数字资本对群众的敲诈，一边向第三世界输出“消费升级”“平台经济”模式，实质是帮助国际垄断资本共同剥削全球无产阶级。

这种背叛国际主义的路线，使中国修正主义不仅在国内成为敲诈人民群众的机器，还在国际上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它与西方消费主义异曲同工，共同构成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双重敲诈。

总结：三大敲诈机制相互勾连，构成官僚资本主义的完整统治链条

2026年“3·15”的三大敲诈机制——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继续革命与群众路线、背叛世界革命与国际主义——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勾连、相互强化的完整体系。它使消费领域彻底沦为官僚资本实现剩余价值、转移阶级矛盾、维持统治的工具。漂白鸡爪不是简单的食品安全问题，而是这一体系下工农群众被毒化敲诈的缩影；外泌体三无产品不是个别的医美乱象，而是官僚资本与伪科学资本联合割韭菜的典型。

只有彻底批判和砸烂这三大敲诈机制，只有重建马列主义先锋队，领导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才能从根本上结束这场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盛宴。对2026年“3·15”具体事件的阶级分析：敲诈盛宴的血淋淋现场

2026年“3·15”晚会曝光的七大消费乱象，不是孤立的“市场乱象”或“企业失德”，而是官僚资本主义敲诈盛宴在消费领域的血淋淋现场。它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暴露了党官僚与垄断资本如何联手，把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变成剩余价值掠夺的新战场。每一桩乱象，都是修正主义路线下生产关系全面复辟的生动写照，都是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的公开敲诈。

一、食品安全乱象：毒化餐桌的敲诈盛宴

工业双氧水漂白鸡爪、冻干草莓重金属超标、锅巴与臭鞋垫一同烘烤……这些令人作呕的场景，正是官僚资本主义对工农群众最直接的毒化敲诈。

在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利润至上原则下，中小企业被垄断资本和官僚特权阶层层层挤压，只能通过降低成本、添加工业有害物质来维持生存。工业双氧水（过氧化氢）被大量用于鸡爪漂白，使其外观更白、更“诱人”，却把致癌风险直接端上底层群众的餐桌。

工人自己都不敢吃，却堂而皇之地生产销售，这正是剩余价值规律的残酷体现：资本为了多榨取一点利润，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劳动人民的健康乃至生命。

2026年晚会曝光的这些案例，绝非“个别黑心企业”问题，而是整个食品生产流通链条已被官僚资本控制的结果。党官僚通过“监管”名义收取保护费，垄断资本通过平台和供应链掌握定价权，底层工农则成为最廉价、最易被毒害的消费群体。这场“舌尖上的盛宴”，本质上是官僚资本主义对人民群众身体和生命的敲诈。

二、医美与健康骗局：割韭菜与伪科学的敲诈盛宴  
外泌体“三无产品”、增高机构“量子修复”“玄学疗法”、社群假专家推销高价药品……这些乱象集中暴露了修正主义下医疗健康领域的全面商品化和伪科学化。

官僚特权阶层享有优质医疗资源，而广大中下层群众却被各种“三无”医美产品和伪科学骗局反复收割。所谓“万能神药”的外泌体注射液，既无生产日期、无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却被包装成“逆龄神器”高价销售，针对的正是那些被消费主义洗脑、渴望“品质生活”的中产和青少年。

这不是简单的“虚假宣传”，而是官僚资本与伪科学资本相互勾连的敲诈盛宴。修正主义政权一方面放任医疗商品化，另一方面又通过“3·15”有限曝光进行表演式“整治”，既维持了资本的超额利润，又收割了群众的愤怒情绪。真正的社会主义应当把医疗健康作为满足人民需要的公共事业，而今日的医美健康领域却彻底沦为割韭菜的工具。

三、数字经济与新兴风险：平台资本与AI敲诈的升级版盛宴

AI大模型“投毒”、荐股“五五分成”诈骗、哈啰等平台租赁不合格电动自行车……这些新兴乱象，标志着官僚资本主义敲诈盛宴已经进入数字时代的高级阶段。垄断平台资本（字节、阿里、腾讯等）与党官僚深度融合，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他们通过算法操控、数据垄断、虚假流量等方式，对群众进行精准敲诈。AI模型被恶意“投毒”后产生有害输出，却被包装成“智能服务”；荐股诈骗以“分成”名义割韭菜；租赁电动车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却仍大规模投放市场……这一切，都是数字资本在官僚保护下对人民群众进行的系统性掠夺。

2026年“3·15”把这些问题作为“新兴风险”轻描淡写地曝光，实质上是为平台垄断资本继续敲诈保驾护航。它拒绝触及平台经济背后的官僚资本所有制问题，拒绝发动群众对数字生产资料进行监督，充分暴露了修正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不过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敲诈的新外衣。

四、具体事件中的进步意义与根本局限

2026年“3·15”晚会曝光在客观上引发了群众的愤怒和讨论，具有一定的自发进步性。它让部分群众看到了毒食品、假医美、数字诈骗的残酷现实，激起了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朴素不满。

然而，这一进步性是极其有限的。整个事件仍被严格控制在“个案整治”“提升品质”的框架内，群众的愤怒被引导到“举报”“等待官方处理”的被动位置，而从未被提升到推翻修正主义统治的政治高度。晚会不触及党官僚与垄断资本的根本勾结，不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不发动群众进行继续革命，这就决定了它最终只能成为官僚资本主义敲诈盛宴的一次例行表演。

正如古巴2026年莫隆事件中群众自发焚烧党部却缺乏先锋队领导一样，中国群众对“3·15”乱象的愤怒，如果没有马列毛主义先锋队的科学指导，也极易被官方“整治秀”再次收割。

总结：敲诈盛宴的血淋淋现场

2026年“3·15”的具体乱象，以最赤裸裸的方式展示了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逻辑：食品安全领域毒化群众身体，医美健康领域割群众钱包，数字经济领域操控群众数据与行为。每一桩乱象，都是剩余价值规律在修正主义条件下的残酷实现，都是党官僚与垄断资本对工农群众的联合敲诈。

只有彻底砸烂这一敲诈盛宴的物质基础——官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重建马列毛主义先锋队，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才能从根本上结束这场血淋淋的盛宴。

政府回应的反动性：维稳表演下的敲诈盛宴延续

2026年“3·15”晚会刚刚落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便连夜部署“专项整治”，地方市场监管局迅速查封涉事产品、立案调查、开展“月月3·15”活动……表面上看，这是一次“雷厉风行”的维权行动；然而，从马列毛主义立场来看，这不过是修正主义政权为维持官僚资本主义敲诈盛宴而进行的一场精心设计的维稳表演。它既不触动党官僚与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也不允许群众将自发愤怒上升为政治革命，而是通过“曝光—表态—有限整治—宣传收尾”的固定流程，继续把人民群众的血汗钱和健康安全牢牢控制在敲诈机器之中。

一、表面“快速整治”的实质：运动式治理保护垄断资本核心利益

晚会曝光漂白鸡爪、外泌体三无产品、AI投毒等乱象后，官方立即高调表态：“连夜部署”“全省专项整改”“严查到底”。四川、重庆等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行动，查封生产线、抽样检测、约谈企业。这种“雷霆手段”看似严厉，实则是一种典型的运动式、表演式治理。

其根本目的不是根除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根源，而是：

- 保护垄断资本和平台经济的核心利益（大资本、平台巨头往往安然无恙，遭殃的多是产业链下游中小企业）；
- 通过有限打击制造“政府有作为”的假象，平息群众一时愤怒；
- 为下一轮敲诈盛宴（下一年的“3·15”或日常消费剥削）腾出空间。

真正的社会主义监管应当是群众直接参与、持久监督、从生产关系高度解决问题的。而修正主义政权的“整治”永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不触及党官僚与资本的勾结关系，从不改变生产资料被官僚资本垄断的现实。因此，2026年的“整治”注定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毒鸡爪、假医美、数字诈骗等敲诈形式必然在更隐蔽、更高明的形态下继续存在。

二、欺骗本质：以“社会共治”“品质生活”为名转移阶级矛盾

官方将2026年“3·15”主题定为“提升消费品质”，大谈“社会共治”“放心消费”“高质量发展”。这些漂亮口号的实质，是把系统性的阶级剥削问题偷换成“技术问题”“个别企业问题”“消费者素质问题”，从而转移群众对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不满。

与古巴修正主义政权在2026年莫隆事件后组织“亲政府反帝游行”、释放部分囚犯以转移视线的手法完全一致，中国修正主义政权也熟练运用“维稳表演”三部曲：

1. 有限曝光，释放群众部分愤怒；
2. 高调整治，制造“政府站在人民一边”的假象；
3. 宣传收尾，将问题重新拉回“个案”框架，禁止深入讨论制度根源。

这种欺骗手法最阴险之处在于：它把群众自发的正当不满引导到“相信政府”“等待整治”的被动轨道上，消耗革命潜力，维护统治稳定。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要求把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路线斗争高度，发动群众批判走资派，而修正主义政权却千方百计把矛盾“个案化”“技术化”，这正是其反动性的集中体现。

三、边缘情况与镇压风险：超出“个案”即遭打压

如果群众的愤怒超出官方划定的“个案”范围，突破“维权”框架，转向质疑党官僚与垄断资本的根本勾结，转向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和群众监督，官方立刻会露出狰狞面目：网络管控、删帖、定性“舆情”“恶意炒作”，甚至动用专政工具进行打压。

2026年“3·15”期间，民间已有声音指出“年年曝光，年年复发，根子在制度”，但此类讨论很快被引导或压制。这再次证明：修正主义政权的“维权”是有严格底线的——底线就是不能触动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一旦触动，这场“维稳表演”就会瞬间转化为赤裸裸的镇压。

这与古巴修正主义政权在莫隆事件中让群众焚烧党部的行为定性为“破坏行为”并逮捕镇压的做法，完全是同一逻辑：新修正主义国际在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时，手段高度一致。

四、根本结论：维稳表演服务于敲诈盛宴的长期延续  
2026年政府对“3·15”乱象的回应，彻底暴露了修正主义政权的反动本质。它不是要结束敲诈盛宴，而是要让这场盛宴更加“可持续”、更加“可控”、更加“隐蔽”。通过表演式整治，它既维持了官僚资本的超额利润，又继续麻痹群众的革命意识，为下一轮更高级、更隐蔽的敲诈做好准备。

只有彻底批判这种维稳表演的欺骗性，只有打破“个案整治”的框架，只有把经济领域的自发不满提升为推翻修正主义统治的政治斗争，才能真正砸烂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机器。

国际角色与全球影响：中国修正主义敲诈模式反面教材

2026年“3·15”这场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盛宴，绝非中国一国的“内部事务”，而是当代新修正主义国际在消费领域的一次集体表演。它以“市场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为遮羞布，把中国经验输出到全球，成为其他修正主义政权模仿的模板，同时也成为全世界革命者最鲜明、最深刻的反面教材。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中国修正主义敲诈模式与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等政权共同构成了一条维护官僚资本主义全球链条。它表面宣扬“中国道路”，实质是帮助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继续敲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一、与中国修正主义敲诈模式融入全球垄断资本链条

2026年“3·15”曝光的AI投毒、平台经济敲诈、医美资本割韭菜等乱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中国修正主义深度融入全球垄断资本链条的必然表现。

中国官僚资本一方面在国内构建“平台+国家”联合敲诈体系（阿里、腾讯、字节等垄断平台与党官僚深度融合），另一方面积极向第三世界输出“数字丝绸之路”“消费升级”模式。所谓“一带一路”中的数字经济合作，很大程度上就是把国内的敲诈经验（算法操控、数据收割、伪科学医美）复制到其他国家，让当地劳动人民也成为官僚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共同掠夺的对象。

2026年AI大模型“投毒”乱象，暴露了中国修正主义不仅在国内允许数字资本敲诈群众，还在全球范围内参与构建新的帝国主义数字剥削体系。它与西方科技垄断资本在本质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共同构成对全球无产阶级的敲诈盛宴。

二、对全球左翼与“粉红潮”政权的负面示范

中国修正主义敲诈模式已成为当代“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活标本。

古巴2024-2026年能源危机与莫隆抗议中，群众同样遭受官僚特权阶层敲诈，民生凋敝却高喊“反帝”；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倒台前也曾大搞“玻利瓦尔革命”式消费宣传，最终同样陷入官僚资本主义危机；俄罗斯“主权民主”下的寡头资本敲诈，更是与“中国模式”高度同构。

这些政权都学习了中国经验：用“社会主义”或“反帝”口号包装官僚资本主义，用“3·15”式维稳表演转移群众视线，用有限“整治”维持敲诈盛宴的长期运转。其结果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名义下被更残酷地剥削，革命潜力被不断消耗。

2026年“3·15”再次向全世界左翼敲响警钟：任何脱离马列毛主义、放弃继续革命、走“市场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权，都必然堕落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机器。所谓“中国特色”“21世纪特色”，不过是修正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披上的最新外衣。

三、对全球毛主义运动的深刻警示

中国修正主义敲诈模式为全世界马列毛主义者提供了最生动、最血淋淋的反面教材。它再次证明了毛主席的伟大论断：“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

无论打着多么“红色”的旗号，无论宣称多么“高质量发展”，只要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要取消群众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式监督，社会主义外壳就会迅速腐烂，官僚资本主义敲诈盛宴就会取而代之。

印度、菲律宾、土耳其、秘鲁等国正在坚持人民战争的毛主义游击队，必须从中国“3·15”乱象中吸取深刻教训：革命胜利后绝不能走“市场改革”道路，必须立即开展继续革命，发动群众监督生产和消费，防止党内走资派蜕变为新资产阶级。

2026年“3·15”告诉我们：官僚资本主义敲诈盛宴不是“发展中的问题”，而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只有坚持马列毛主义，只有重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有准备持久人民战争，才能避免重蹈中国、古巴等国的覆辙。

四、国际主义视角下的革命任务

在全球帝国主义危机日益深化的今天，中国修正主义敲诈模式不仅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也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障碍。它在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延缓总危机，同时又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提供了最直接的觉醒教材。

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我们：一方面坚决揭露和批判中国修正主义敲诈模式，另一方面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反修正主义斗争，把中国“3·15”暴露的愤怒火种，转化为全球埋葬官僚资本主义和一切修正主义的革命烈火。

结论与革命号召：砸烂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盛宴

2026年“3·15”这场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盛宴，已经彻底暴露了当代中国修正主义政权的腐朽本质。它不是一次偶然的“消费维权日”，而是党官僚与垄断资本联手对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系统性、长期性剩余价值掠夺的年度仪式。从工业双氧水漂白鸡爪毒害餐桌，到外泌体三无医美产品割韭菜，再到AI投毒与平台经济的数字敲诈，每一桩乱象都以最赤裸裸的方式证明：所谓“提升消费品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不过是官僚资本主义继续敲诈人民群众的最新遮羞布。

历史已经给出了铁定的结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消费保障的进步，到1978年后修正主义路线主导下的全面复辟，再到今天“3·15”维稳表演下的敲诈盛宴，中国走过的是一条完整的和平演变道路。这条道路与古巴从1959年革命到2026年莫隆抗议的蜕变完全一致，都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继续革命、背叛世界革命的必然结果。毛主席的伟大论断“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在2026年“3·15”的血淋淋现场再次得到最无情的验证。

这场敲诈盛宴的三大机制——把消费维权变成保护垄断资本的工具、把群众自发斗争个案化仪式化、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输出全球——相互勾连，构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在消费领域的完整统治链条。

它不仅毒害人民群众的身体，掠夺人民群众的血汗钱，更腐蚀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把正当不满消耗在“等待官方整治”的被动轨道上。其欺骗性、残酷性和长期性，远超西方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

今天，纪念马克思逝世143周年，我们绝不能停留在抽象的理论缅怀，而必须把纪念变成彻底的反修战斗动员。2026年“3·15”这场敲诈盛宴再次告诉我们：官僚资本主义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只会不断变换花样、升级手段，继续维持其敲诈机器。只有彻底砸烂这一盛宴的物质基础——官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有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先锋队，只有发动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结束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剥削闹剧。

#### 革命行动纲领

当前，一切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1. 深入群众，揭露敲诈本质。把2026年“3·15”暴露的毒鸡爪、假医美、数字诈骗等乱象，提高到批判官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路线高度，向工农群众宣传马列毛主义，戳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骗局。
2. 秘密重建先锋队组织。在工厂、农村、大学和社区建立马列毛主义支部，开展群众路线工作，将自发的维权愤怒提升为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斗争。
3. 坚持继续革命，准备人民战争。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市场改革”和“维稳表演”，发动群众对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进行监督，防止走资派继续蜕变，准备以持久人民战争埋葬官僚资本主义。
4. 高举国际主义旗帜。揭露中国修正主义敲诈模式对全球左翼的毒害，支持印度、菲律宾、土耳其等国的人民战争，支持拉美、非洲被压迫人民的反帝反修正主义斗争，把中国“3·15”的愤怒火种，转化为世界革命的燎原烈火。

#### 最终展望

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总危机的前夜，帝国主义战争、经济崩溃、生态灾难正在加速其灭亡。修正主义政权尽管披着“社会主义”外衣，但其内在矛盾已无法调和，2026年“3·15”不过是这一总危机的又一次集中爆发。

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只有彻底砸烂一切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盛宴，才能迎来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新时代——一个没有剥削、没有敲诈、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美好世界！

砸烂官僚资本主义的敲诈盛宴！

打倒现代修正主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Proletarios de todos los países, uníos!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万岁！



# 论政权问题

## 一、引言：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政权问题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形式”或“治理模式”问题，而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决定革命成败、社会主义存亡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兰西内战》）这句经典论断，彻底否定了机会主义者幻想通过改良、议会道路和平“接管”资产阶级国家的幻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尖锐批判了考茨基之流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强调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毛泽东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把这一原理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战争和战略问题》），并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系统阐明：“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些经典论述不是孤立的语录，而是马列毛主义关于政权理论的核心灵魂。它告诉我们：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也在于对政权问题的动摇、背叛或篡夺。离开这个根本问题，任何“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力决定论”或“和平过渡”论调，都只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复辟的遮羞布。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这一真理被反复证明。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根本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没有及时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没有建立起稳固的工农政权，导致凡尔赛反动派的反扑。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则是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坚决执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路线，通过武装起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结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更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战略的生动体现：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延安抗日民主政权，再到全国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一不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工农政权。反观那些放弃政权斗争的“和平道路”实验——如智利阿连德政府的议会选举道路，最终在1973年皮诺切特军事政变中被血腥推翻——无不以惨痛失败告终。这些历史铁证表明：政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不是资产阶级可以“拱手相让”的礼物；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和长期武装斗争，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并巩固。

在当代世界，这一根本问题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和紧迫。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修正主义逆流。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抛出“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纲领，实质上是公开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把社会主义国家机器蜕变为官僚特权阶层的资产阶级专政工具。这条路线的延续，

最终导致1989-1991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红色政权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亿万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中国的教训同样惨痛：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集团通过“两个凡是”的反扑和“真理标准”讨论的伪装，发动了右倾复辟政变。他们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名，实质上是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取代“继续革命”理论，用资产阶级法权复辟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结果是：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官僚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党内走资派转化为新资产阶级；人民军队逐步“非政治化”“国家化”；意识形态领域去毛化、去阶级化，社会主义中国蜕变为“中国特色”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环节，亿万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被少数权贵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瓜分，阶级矛盾空前激化。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修正主义在政权问题上全面背叛马列毛主义的必然结果。修正主义者共同的特征是：否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鼓吹“议会道路”“多党制民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宣扬“阶级调和”与“全民民主”；把国家机器从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改造为保护新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他们表面上高举“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际上执行的是社会帝国主义或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路线。马列毛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从来不是理论上的“学术争论”，而是生死存亡的政权斗争。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强调：“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一论断已被苏联和中国几十年的实践彻底验证。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下，我们必须高举马列毛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反修正主义的坚定立场，重新把政权问题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来认识、来实践。本文的目的，正是系统阐明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政权的理论基础，展示毛泽东思想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深刻批判赫鲁晓夫-邓小平路线的修正主义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代无产阶级在全球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战略与战术。只有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和巩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将回溯马列主义政权理论的经典论述及其历史局限；第三部分集中阐述毛泽东对马列政权理论的继承、丰富与发展，特别是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第四部分将对苏联和中国修正主义在政权问题上的背叛进行系统批判，总结历史教训；第五部分则立足当代世界形势，提出新时期夺权与保权的具体战略战术；最后在结论中发出战斗号召。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今天，面对帝国主义垂死挣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深化，以及修正主义堡垒的暂时猖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温这一真理，准备进行新的、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已经证明：只有马列毛主义才能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一切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投降主义都必将被历史抛进垃圾堆。让我们以“造反有理”“继续革命”的战斗精神，投身于埋葬一切剥削制度的伟大事业中去！

## 二、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政权的理论基础

马列主义关于国家与政权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制定战略策略的根本依据。它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原始公社解体、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利益，必然需要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器——国家。这个机器的核心是军队、警察、监狱、官僚机构等强制力量，其本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强调，资产阶级国家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君主立宪、议会民主还是法西斯独裁——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变种。它通过“自由”“平等”“民主”等虚伪口号，掩盖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议会不过是“清谈馆”，军队和警察才是真正的“国家机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机器的服务对象是垄断资本集团，它镇压工人罢工、维护私有制、对外推行帝国主义战争，一切“民主”形式都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这一本质揭示具有普遍性。无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都是剥削阶级的忠实卫士。修正主义者如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妄图用“议会道路”“和平过渡”来麻痹无产阶级，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涂脂抹粉，否认其阶级本质。马列主义坚决反对这种机会主义幻想，强调国家机器不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革命手段加以打碎。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马列政权理论作了系统总结和创造性发展。这部著作写于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是直接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战斗檄文。列宁尖锐批判考茨基把国家歪曲为“阶级调和的工具”和“超阶级的民主机构”的谬论，恢复了马克思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理。巴黎公社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必须彻底摧毁它——打碎常备军、官僚机构、议会制等全部压迫工具，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这种新型政权的形式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它不是脱离群众的官僚机构，而是直接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



随时可以撤换的代表机关；它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起来，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廉价政府；它依靠武装的人民群众，而不是脱离人民的常备军。十月革命正是按照这一路线，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证明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正确性。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质，是马列主义政权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而是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过程。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与新型专政（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相结合的国家”。它的历史任务包括：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剥夺资本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制度；改造小生产者，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发展生产力，为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列宁晚年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特别警惕社会主义政权内部的官僚主义蜕化危险。他指出，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旧社会的残余——资产阶级法权、特权思想、官僚作风——仍会通过各种渠道腐蚀党和国家机关。如果不警惕，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政权性质的局部变质。因此，必须不断加强党内民主、群众监督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防止“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然而，早期马列主义在政权理论上也存在历史局限性，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得以超越和发展的前提。列宁时代，苏联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国内阶级斗争异常激烈，政权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苏维埃、粉碎白匪和外国武装干涉。列宁虽然敏锐地看到官僚主义危险，

### 关于我们：

我们是中国的一个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组织，于2024年7月4日在浙江杭州成立，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组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 我们的官网：

<https://emancipationoflabour.wordpress.com/>

### 订阅我们的报纸：

<https://t.me/CPCMarxismLeninism>

有意者可通过以下邮箱来申请加入我们（一旦审核通过，便会成为我们的成员）

投稿邮箱：[cpcmloficial@gmail.com](mailto:cpcmloficial@gmail.com)

联系邮箱：[CPCMLOfficial@proton.me](mailto:CPCMLOfficial@proton.me)

但尚未系统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问题，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资产阶级如何在党内、在上层建筑领域“复辟”的问题。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巨大成就，但在理论上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提出了“阶级消灭论”和“技术决定一切”，在政权建设上过度依赖行政命令和肃反扩大化，而未能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监督党和国家机关。这为后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篡夺政权留下了隐患。

正是这些局限，为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列政权理论提供了空间。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国家本质、暴力革命、打碎旧机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原理，同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权颜色变不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重大课题。这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马列主义政权学说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马列主义政权理论的上述内容，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指南。它告诉我们：国家机器的阶级性是不可调和的，改良主义、议会道路是死路一条；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开辟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而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必须警惕内部的资产阶级复辟危险，坚持长期的阶级斗争。修正主义者无论打着何种“创新”旗号，都必然在政权问题上暴露原形——他们要么公开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今天，重温这些经典论述，具有极强的现实战斗意义。它是批判邓小平-习近平修正主义路线的锐利武器，是指导当代无产阶级重建革命政党和红色政权的理论灯塔。

### 三、毛泽东思想对马列政权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具体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政权理论的崭新阶段。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国家本质、暴力革命、打碎旧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原理，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了早期马列主义尚未充分展开的重大课题：



如何在落后东方国家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通过群众性阶级斗争使政权永远掌握在人民手里。毛泽东对政权理论的贡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它把马列主义从“俄国道路”的具体形式，提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中国道路”，并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提供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科学武器。

首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系统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这是对马列政权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1945年《论联合政府》和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光辉著作，集中体现了这一理论的精髓。毛泽东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革命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因此，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政权，不能简单照搬苏联单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而必须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政权形式区别于资产阶级专政，也区别于苏联模式：它实行“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工农联盟是基础，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一部分被暂时团结和利用，但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改造。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政权的核心任务是“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

这一理论的创造性在于：它把马列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既坚持了政权阶级本质的不可调和性，又灵活处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地位，避免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是这一理论的伟大实践：人民解放军打碎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器，建立了以工农兵代表会议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迅速巩固了新生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证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过渡性人民政权，然后不间断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对列宁“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革命理论”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打破了“只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首先胜利”的机械教条。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把政权理论推向新高度，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最伟大贡献，解决了“政权建立后颜色会不会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历史性难题。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法权（工资等级制、商品交换、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等）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5年《二十三条》明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主要危险。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长期存在、曲折复杂，有时甚至很激烈”，单靠经济建设不能解决政权问题，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斗私批修”，不断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劳永逸的“终点”，而是“继续革命”的起点。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是主要危险，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逐步改变政权性质。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必须“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依靠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公开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派。这就是1966-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文革是马列毛主义政权理论的最高峰，它第一次系统解决了“谁来监督共产党”“如何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修正主义国家”的世界性难题。

文革的政权实践，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夺权。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在张春桥、姚文元等支持下，夺取了走资派把持的党政财文大权，建立了新型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这是对巴黎公社原则和苏维埃经验的创造性运用。二是实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代表相结合，既保证党的领导，又防止官僚化，确保政权与群众血肉相连。三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实质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文革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自由），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公开化，亿万群众直接参加政权监督，打破了“党内和平”的迷梦。

四是“党指挥枪”的原则得到空前加强。毛泽东强调“枪杆子必须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军队支持左派，防止军队国家化倾向。

文革期间，政权建设的三大法宝得到全面发挥：一是党指挥枪，彻底反对“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的修正主义谬论；二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对“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三是民主集中制与大民主相结合，强调“造反有理”，反对“驯服工具论”。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通过这些法宝，文革把政权牢牢置于群众监督之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试行人民公社新体制，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尽管文革后期存在“左”的偏差和派性干扰，但其主流是正确的，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尝试，是对马列政权理论的空前发展。国际上，阿尔巴尼亚、秘鲁光辉道路等都从中汲取了宝贵经验。

毛泽东政权理论的上述发展，具有多重深远意义。从理论角度，它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证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社会主义时期尤为突出；从实践角度，它为落后国家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路径；从国际角度，它打破了苏修“社会主义模式”的垄断地位，为第三世界革命提供了武器。修正主义者攻击文革“破坏生产”“搞乱了秩序”，实质是站在走资派立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历史已经证明：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集团正是通过否定文革、否定继续革命，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从反面验证了毛泽东理论的正确性。

总之，毛泽东思想把马列政权理论从“打碎旧机器、建立专政”推进到“巩固专政、继续革命”的新阶段。它告诉我们：政权问题一刻也不能放松；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群众的专政”，而非少数人的“党专政”；只有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群众、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才能使红色政权永不变色。这一理论是当代反修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重建革命政权的指路明灯。

四、反修正主义斗争在政权问题上的核心表现与历史教训

反修正主义斗争是马列毛主义政权理论的生命线。毛泽东指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这一论断不是抽象警告，而是被20世纪中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惨痛实践反复验证的铁律。从赫鲁晓夫到邓小平，修正主义者无一例外在政权问题上暴露原形：他们或公开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或暗中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导致红色政权变色、社会主义事业夭折。今天，系统剖析修正主义在政权问题上的核心表现与历史教训，对于当代无产阶级重建革命政党、夺取和巩固政权，具有生死攸关的现实意义。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不是“工作错误”或“政策偏差”，而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复辟路线；只有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坚持马列毛主义，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首先，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政权蜕变的典型。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抛出“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纲领，公开背叛马列主义政权理论。所谓“和平过渡”，就是否定暴力革命和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鼓吹通过议会选举“长入”社会主义；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就是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国家不再是阶级压迫工具，而是“全体人民”的超阶级机构。这实质上是公开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早已批判过类似谬论：“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到了极点。”赫鲁晓夫集团却把它作为“创新”推行。

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官僚特权阶层迅速形成：党政军高级干部享有特供商店、别墅、专车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脱离群众，蜕变为新剥削阶级。国家机器从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蜕变为保护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勃列日涅夫时期进一步推行“发达社会主义”论，掩盖阶级斗争，推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与美帝国主义妥协，实质是社会帝国主义。杜勒斯1957年预言的“和平演变”战略——“要使社会主义国家从内部演变”——在苏联得到完美实现。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新思维”公开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和私有化，彻底解体苏联。1991年“八一九事件”失败后，红色政权土崩瓦解，亿万苏联人民重新沦为资本奴隶，民族矛盾激化，经济崩溃。这一切根源在于政权问题上的背叛：放弃“党指挥枪”，推行军队“非政治化”；放弃群众路线，官僚机构膨胀；放弃继续革命，宣扬“阶级调和”。苏联的教训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一旦被修正主义篡夺，社会主义就必然复辟资本主义；“全民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遮羞布。中国修正主义路线的演变更为隐蔽、危害更大。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集团通过阴谋政变上台，发动了右倾复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阶级斗争为纲”，实质是用“生产力决定论”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邓小平公开宣扬“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否定政权阶级性质，鼓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私有化开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论进一步把共产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为

“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公开允许资本家入党，标志着党政机关资产阶级化。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表面“以人为本”，实则掩盖官僚资本主义对工农的剥削。习近平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在“强国”“民族复兴”旗号下，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方面加强党对军队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另一方面把政权彻底改造为服务于权贵资本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工具。

政权蜕变的具体表现触目惊心：一是军队国家化倾向抬头。邓小平取消政治委员制度、推行“军队非党化”

“非政治化”，江胡时期进一步“职业化”，习近平虽表面“党指挥枪”，实则把军队变为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放弃支持左派、镇压走资派的革命职能。二是党政官僚化。干部终身制、特权阶层形成，贪腐成风，国有资产被家族式瓜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沦为橡皮图章。三是司法资产阶级化。法院、检察院为资本家服务，“依法治国”成为镇压工人农民维权的工具。四是意识形态去毛化。文革被全盘否定，继续革命理论被污蔑为“动乱”，马列毛著作被淡化，代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理论。结果是：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中国特色”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亿万工农重新受二重剥削（国内资本+帝国主义），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环境破坏、贫富差距达到世界前列。

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权问题上的共同特征，可以概括为五点：第一，否定暴力革命和打碎旧国家机器，鼓吹“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多党制民主”，实质是向资产阶级缴械投降；第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宣扬“阶级调和”“全民民主”“全民党”，把国家机器从无产阶级工具改造为资产阶级工具；第三，推行“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建设为中心”，用经济主义取代阶级斗争为纲，掩盖上层建筑领域的复辟；第四，推行修正主义国际路线，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妥协投降，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社会帝国主义；第五，压制群众运动，打击革命左派，维护官僚特权。无论苏联“赫鲁晓夫主义”还是中国“邓小平理论”，本质都是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篡夺政权。

反修斗争的国际经验提供了宝贵启示。恩维尔·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马列主义，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数十年，虽最终因内外压力失败，但证明了反修必须从政权抓起。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在贡萨罗主席领导下，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开展人民战争，建立根据地红色政权，沉重打击了修正主义议会道路幻想。尼泊尔毛主义者在普拉昌达早期阶段曾尝试“议会+武装”结合，但最终因放弃人民战争、搞“和平过渡”而蜕变，教训深刻。印度毛主义（纳萨尔巴里运动延续）至今坚持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工农红色政权，证明只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能真正对抗修正主义堡垒。这些经验共同说明：反修不是“党内和平”或“理论批判”，而是必须与武装夺权、建立根据地相结合；只有坚持马列毛主义、开展人民战争，才能真正夺回被篡夺的政权。

历史教训极为深刻：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它总是打着“创新”“发展”旗号，从政权内部攻破堡垒；“和平演变”比武装进攻更危险；一旦政权变色，社会主义成果将毁于一旦，劳动人民将付出血的代价。今天，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中国修正主义堡垒的暂时猖獗，无产阶级必须牢记这些教训：高举反修大旗，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深入工农群众，准备长期武装斗争。只有彻底批判并战胜修正主义，才能为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扫清道路。

#### 五、当代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战略与战术

在全球资本主义复辟的当代历史条件下，政权问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尖锐和紧迫。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今天，帝国主义进入全面垂死阶段，社会主义局部倒退后形成的修正主义堡垒暂时猖獗，全球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要重新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必须高举马列毛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反修正主义斗争，制定科学的战略战术。这一战略战术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立足当前世界形势、总结历史正反经验、指导革命实践的行动指南。它必须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如何在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重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如何在夺权后防止政权再度变色？只有彻底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开辟道路。

首先，必须对当前世界形势作出科学分析，这是制定战略战术的前提。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今天，这一论断更加正确。全球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金融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虚拟经济泡沫化，生产过剩与工人贫困化并存，生态破坏达到临界点，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如乌克兰冲突、中东战火）此起彼伏。资本主义已无法用“和平”方式解决其内在矛盾，只能通过战争和法西斯化维持统治。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复辟，使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工厂”和修正主义堡垒：官僚垄断资本与跨国帝国主义勾结，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对内镇压工农维权，对外输出资本和“债务陷阱”，实质是社会帝国主义特征。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则完全沦为依附性资本主义。第三世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仍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印度、菲律宾、秘鲁、土耳其等国的人民战争和武装斗争持续发展，证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当代依然有效。总体形势是：帝国主义垂死挣扎，修正主义堡垒外强中干，革命形势在第三世界成熟，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处于积蓄力量的阶段。修正主义者宣扬“全球化和平”“多极化稳定”，实质是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辩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看到：资本主义总危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主观上需要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

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马列毛主义根本原则，开展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人民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阐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真理，在当代第三世界仍有直接指导意义。具体战术是：以农村为主要战场，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色政权；逐步扩大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通过持久人民战争，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在中国这样的修正主义堡垒国家，革命同样要从农村和边远地区开始，避开敌人统治核心，发动最受压迫的工人农民群众。必须彻底批判各种修正主义幻想：所谓“城市中心论”是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混合，忽视农村广大群众基础；所谓“选举道路”“议会过渡”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绝不会“和平让权”；所谓“和平发展”“合法斗争”是取消革命的麻醉剂。历史早已证明：智利阿连德、尼泊尔后期毛主义者的“和平过渡”实验都以失败告终。只有坚持“武装夺取政权”，才能真正打碎旧机器。新时代人民战争还需结合当代条件：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传播革命思想，但绝不能取代枪杆子；建立地下党和群众组织，防止敌人“数字极权”镇压；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始终掌握主动权。

巩固政权的长期任务，是夺权后防止“和平演变”和“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关键，必须贯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全过程。毛泽东在文革中总结的经验是：政权巩固不是一劳永逸，而是通过持续阶级斗争实现的。首先，防止和平演变的核心是持续开展党内整风、群众监督和反特权斗争。必须反对“驯服工具论”，实行“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让亿万群众直接监督党和国家机关，随时撤换走资派。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形式（革命干部、军队代表、群众代表）应作为基本政权组织，防止官僚化。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必须彻底消灭私有制，实行人民公社式的集体所有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的“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需要通过人民公社、供给制等形式逐步实现，批判“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经济路线。再次，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必须常抓不懈。继续“斗私批修”，批判修正主义思想残余，开展群众性政治学习，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学校、文艺、媒体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法权在思想领域的表现。只有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革命同时推进，政权才能永不变色。

组织形式的创新，是适应新时代条件的必然要求。传统苏维埃和革命委员会的经验需结合当代实际发展：建立工农兵学商联合政权，吸收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中小工商业者中的进步力量，形成最广泛的反帝反修统一战线；利用互联网时代群众路线的新形式（如革命网络论坛、地下宣传），但必须警惕“数字资本主义”对群众运动的渗透和控制；

军队建设坚持“党指挥枪”，反对“国家化”“职业化”，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随时准备镇压复辟势力。国际主义维度不可或缺：当代革命必须支持全球人民战争，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区别于修正主义“和平共处”或“多极化”伪国际）。中国作为修正主义堡垒，其革命胜利将极大推动世界革命；第三世界各国革命相互支援，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全球战略态势。

当代战略战术的上述内容，体现了马列毛主义原则的稳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它不是机械照搬历史，而是立足全球资本主义总危机、修正主义复辟现实和第三世界革命实践的科学总结。修正主义者攻击“人民战争过时”“暴力革命不现实”，实质是害怕无产阶级重新掌握枪杆子。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有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通过继续革命巩固政权，才能粉碎一切复辟阴谋。今天，面对帝国主义垂死挣扎和修正主义堡垒的暂时强大，真正的革命者必须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心，深入工农群众，重建马列毛主义政党，准备长期艰苦奋斗。政权问题一刻也不能放松。只有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坚持反修正主义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在当代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夺取和巩固政权，为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六、结论：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为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到底

通过以上五个部分的系统阐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权问题贯穿马列毛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本质，到列宁《国家与革命》系统论证打碎旧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再到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马列毛主义始终把政权牢牢置于阶级斗争的中心位置。反修正主义斗争，则是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永恒主题。赫鲁晓夫-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教训血淋淋地证明：一旦在政权问题上动摇、背叛或篡夺，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就会迅速变色，亿万劳动人民就会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文革的伟大实践与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复辟的现实，进一步验证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1965年）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一胜利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平坦的，而是充满曲折、反复和斗争。修正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它总是打着“创新”“发展”“适应时代”的旗号，从内部攻破堡垒，推行“和平过渡”“阶级调和”“生产力决定论”，实质是复辟资本主义。今天，全球帝国主义陷入总危机，中国修正主义堡垒外强中干，第三世界革命形势日益成熟，正为无产阶级重新夺取政权提供了客观条件。

但主观上，革命者必须时刻警惕“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危险，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政权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代革命者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必须高举马列毛主义伟大旗帜，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深入工农群众，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准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当代第三世界和修正主义堡垒国家同样适用。夺权之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通过革命委员会、三结合、大民主等形式，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监督政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走资派复辟。只有这样，才能使红色政权永不变色，为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国际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支持全球人民战争，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反对一切“和平共处”“多极化”的修正主义伪装。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今天，我们面对的敌人虽然貌似强大，但不过是纸老虎。苏联解体和修正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已经唤醒了亿万革命者；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工农群众的自发斗争，正在孕育新的革命高潮。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乐观主义，投身于埋葬一切剥削制度的伟大事业。让我们继承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传统，高举马列毛主义红旗，为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到底，直到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马列毛主义才能指引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一切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投降主义都必将被历史抛进垃圾堆。斗争正未有穷期，胜利必属于坚持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

# 再论建党问题

一、引言：建党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和根本保证。在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建党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组织技术或“建党时机”的次要问题，而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和根本保证，是无产阶级能否战胜资产阶级、开展人民战争、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决定性环节。列宁在《怎么办？》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号召：“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毛泽东则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and 最高组织形式”，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贡萨罗主席在当代把这一原理提升到新高度，强调“党是革命的司令部，是人民战争的中心和灵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没有正确的党，就没有正确的路线；没有真党，就没有人民战争，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一真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被反复证明。1903年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建成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和孟什维克取消主义，才有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一大”建党，到井冈山“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党原则，再到延安整风和全国解放，无一不是先建党、再建军、再夺权的成功典范。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在贡萨罗主席指导下，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面对修正主义泛滥和军事独裁，先从意识形态上重建真党，确立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为指导，制定“人民战争总路线”，然后才发动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和红色政权，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统治。这些历史铁证表明：一切革命胜利，都以正确建党为先决条件；反之，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苏共领导权、中国邓小平集团1976年右倾复辟，都是因为党蜕变为修正主义党，导致红色政权变色、社会主义事业夭折。

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复辟的条件下，这一问题更加尖锐和紧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修正主义逆流的最严重冲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复辟，使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失去了统一的革命司令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一方面推行“去党化”“多党制民主”“公民社会”幻想，另一方面在左派内部散布“无党派革命”“自发斗争”“直接行动”等机会主义思潮。这些论调表面上“激进”，实则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在建党问题上的新变种。它们否定党的先锋队作用，鼓吹“斗争中自然产生党”“武装行动自动生成党”，客观上为警察特务渗透、宗派主义分裂和革命力量瓦解提供了便利。今天，全球资本主义总危机深化，工农群众自发斗争此起彼伏（如欧美罢工浪潮、第三世界农民起义），

但若无正确政党的领导，这些斗争只能停留在经济主义或盲动主义层面，最终被资产阶级镇压或收买。唯有先建党、建真党，才能把分散的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的革命高度，才能制定人民战争战略，才能在修正主义堡垒（中国等）和半殖民地国家开辟革命根据地。

反修正主义立场在这里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是唯一能够指导当代建党的科学理论。它与一切修正主义建党谬论划清界限：反对“全民党”“议会党”“社交媒体党”等资产阶级政党模式；反对“从下到上自发建党”的右倾错误；反对“直接行动建党”的行动主义幻想。贡萨罗思想特别强调：在帝国主义垂死阶段和修正主义复辟条件下，建党必须“先从上层、从意识形态抓起”，确立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指导地位，制定正确政治路线，然后自上而下组织建党。这不是机械的“顺序论”，而是辩证统一的革命辩证法——建党为先，建党贯穿始终。没有这个“先”，人民战争就失去了灵魂，统一战线就失去了核心，革命就必然失败。

当前“党是从直接行动中产生的”错误论断，正是我们要重点批判的对象。它是第二国际经济主义、托洛茨基取消主义和现代无政府主义、行动主义在当代的翻版。该论断否定党的先锋队作用，宣扬“运动就是一切”“斗争自然出党”，实质上是取消主义在建党问题上的新表现。它在数字时代特别危险：一些小团体以“网络动员”“街头行动”为名，拒绝严肃的理论和组织建设，结果沦为警察监控下的“表演式左派”或宗派小集团。历史早已证明：巴黎公社因缺乏集中统一政党领导而失败；中国早期盲动主义因无正确建党而受挫；秘鲁早期“游击中心论”被贡萨罗纠正为“先建党、再人民战争”。只有彻底批判这类错误，坚持“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先行，组织上随之跟进”，才能避免重蹈“没有司令部的军队必然失败”的覆辙。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下，我们必须高举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反修正主义的坚定立场，重新把建党问题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来认识、来实践。本文的目的，正是系统阐明为什么要先建党，深刻批判“党是从直接行动中产生的”错误论断，阐述贡萨罗思想指导下的党的性质、组织结构（同心圆建设），并提出从上到下政治建党的战略战术。只有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才能领导当代人民战争，夺取无产阶级政权，为共产主义事业开辟道路。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将回溯马列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关于建党的理论基础及其战略意义；第三部分集中批判“党是从直接行动中产生的”错误论断，从理论、历史、现实多角度进行剖析；第四部分阐述党和党的组织的结构，特别是贡萨罗思想下的同心圆建设；第五部分提出从上到下政治建党的具体方法与实践；最后在结论中发出战斗号召。

建党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今天，面对帝国主义垂死挣扎、修正主义堡垒的暂时猖獗，以及全球革命形势的孕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温这一真理，立即行动起来，重建马列毛主义政党。历史已经证明：只有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才能指导我们建真党；一切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行动主义都必将被历史抛进垃圾堆。让我们以“造反有理”“继续革命”的战斗精神，投身于重建革命党的伟大事业，为无产阶级政权和世界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

二、为什么要先建党：马列毛主义和贡萨罗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先建党”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组织技术问题，而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和根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全球复辟、修正主义猖獗的当代历史条件下，重新夺取政权、开展人民战争的决定性前提。党不是群众自发斗争的“附属品”，而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贡萨罗思想武装起来的先锋队。没有这样一个党，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阶级意识，就无法把分散的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的革命高度，就不可能制定正确路线、培养革命干部、建立根据地和红色政权，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贡萨罗主席明确指出：“没有党，就没有革命；没有真党，就没有人民战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论断是当代建党理论的灵魂，它告诉我们：建党必须先行，建党贯穿始终；任何把建党推迟到“行动之后”或“斗争自然产生”的论调，都是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表现。

这一原理的理论基础，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系统确立了建党原则，宣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先进和最坚决的部分”，是“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他们强调，党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决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空想主义。只有通过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才能从“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才能实现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飞跃。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把这一原理发展到新高度。在《怎么办？》中，他尖锐批判了经济主义和“自发论”——工人运动只能自发产生工联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创立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强调党必须是职业革命家组织，是高度集中、纪律严明的战斗堡垒。只有先建党，才能在沙皇专制和机会主义包围中制定“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正确路线，最终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列宁的建党理论彻底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自发成长论”，为后世提供了永不过时的指南。

毛泽东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列建党理论。毛泽东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and 最高组织形式”，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力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党”的根本原则，提出“支部建在连上”，把党的组织深深扎根于工农群众和革命军队之中。延安整风运动更是思想建党的光辉典范，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纯洁了党的队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毛泽东反复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矛盾论》）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如果不先建党，就无法把农民的分散武装斗争统一为人民战争，无法把工农联盟锻造成革命主力军。中国革命的全部经验证明：先建党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前提，没有1921年“一大”建党，就没有井冈山根据地，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贡萨罗思想作为马列毛主义在当代的最高发展，把建党问题提升到新的科学高度。贡萨罗主席在秘鲁革命实践中，面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泛滥和军事独裁统治，明确提出“党是人民战争的司令部，是革命的中心和灵魂”。他强调，在帝国主义垂死阶段和修正主义复辟条件下，建党必须“先从上层、从意识形态抓起”：首先确立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指导地位，制定人民战争总路线，然后自上而下组建党的领导核心，再逐步向基层和群众中扩展。这不是机械的“顺序论”，而是辩证统一的革命辩证法——建党为先，才能保证人民战争的正确方向；建党贯穿始终，才能防止党内走资派篡权。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正是在贡萨罗思想指导下，先重建真党（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然后于1980年发动人民战争，建立根据地和红色政权，沉重打击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这一实践证明：贡萨罗思想解决了当代“如何在修正主义堡垒和半殖民地国家重建真党”的历史难题，是反修防修、开展持久人民战争的锐利武器。

“先建党”的现实必要性，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显得尤为紧迫。全球资本主义已进入全面总危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帝国主义战争（如乌克兰、中东冲突）重新瓜分世界，生态危机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同时，修正主义堡垒（中国等）推行“去党化”“多党制民主”“公民社会”等幻想，一方面用国家资本主义收买部分工人贵族，另一方面用“数字极权”监控群众斗争。工农群众的自发斗争虽然不断涌现——欧美罢工浪潮、第三世界农民起义、工厂维权运动——但若无正确政党的领导，这些斗争必然停留在经济主义、盲动主义或改良主义层面，最终被资产阶级镇压、分化或收买。修正主义势力正利用“无党派革命”“网络行动主义”等伪装，瓦解革命力量。只有先建党，才能把分散的自发斗争统一为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才能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高度，才能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开辟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

“先建党”的战略意义在于：党是革命的“火车头”和“司令部”。只有先建党，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人民战争道路、反修防修），才能培养忠于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革命干部，才能建立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和统一战线，才能在长期艰苦斗争中保持无产阶级纯洁性。贡萨罗主席反复告诫：“没有真党，就没有人民战争。”这不是把建党与革命割裂，而是强调建党是革命的开端和灵魂。建党先行，才能避免“没有司令部的军队必然失败”的历史悲剧；建党贯穿始终，才能在夺权后继续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总之，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关于“为什么要先建党”的理论基础，构成了当代重建革命政党的科学指南。它告诉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必须先从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抓起；先建党是辩证统一的革命要求，是反修正主义、开展人民战争的根本保证。今天，重温这些经典论述，具有极强的现实战斗意义。它是批判“直接行动建党”

“自发论”等错误思潮的锐利武器，是指导全球革命者重建真正马列毛主义政党的理论灯塔。只有高举这一旗帜，才能在资本主义总危机中开辟革命新高潮，为无产阶级政权和世界共产主义而奋斗。

### 三、批判“党是从直接行动当中产生的”错误论断

“党是从直接行动当中产生的”这一论断，是当代左派运动中一种极具欺骗性和危害性的机会主义谬论。它表面上“激进”“贴近群众”“强调实践”，实则是自发论、经济主义、行动主义在建党问题上的当代翻版，是修正主义、取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混合产物。这一错误论断否定党的先锋队作用和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指导地位，鼓吹“斗争中自然产生党”“武装行动自动生成党”“街头运动自发建党”，实质上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瓦解革命力量，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势力提供便利。今天，在全球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修正主义堡垒暂时猖獗的条件下，彻底批判这一谬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是重建真正马列毛主义政党的必经步骤，是反修正主义斗争在建党领域的具体体现。

首先，必须深刻揭露这一错误论断的实质与历史来源。它绝非什么“新理论”或“创新实践”，而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幽灵在当代的还魂。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论调，早已把党降低为“自发工人运动的尾巴”；考茨基的“自发成长论”则宣称党可以从议会斗争和工会运动中“自然长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也夹杂着取消主义倾向，否定党在革命准备阶段的独立建党任务。现代版本则进一步融合了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派”）、后现代“网络行动主义”和某些假左派小团体的“群众自发建党论”。

它们共同特征是：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面灌输”（列宁），否定党是“最先进和最坚决的部分”（《共产党宣言》），把党视为“直接行动”的附属品或副产品。贡萨罗思想尖锐指出，这种论调是“机会主义在组织路线上的表现”，它把革命降低为“盲目的自发骚动”，最终必然被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各个击破。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锡安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群众性民族自发运动，而是一个高度依赖外交斡旋、国际承认和大国背书的政治项目。赫茨尔及其后继者并不是主要依靠当地人民的联合斗争来实现目标，而是不断寻求欧洲列强的支持，希望通过大国授权来推进定居和建国。这一点已经预示了它日后的发展方向：它不是去打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秩序，而是要借助这个秩序来完成自己的国家工程。正因如此，锡安主义从早期开始，就和帝国主义具有天然的亲和性。

理论上的批判是根本。列宁在《怎么办？》中早已对“自发论”进行了毁灭性打击。他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争取出卖劳动力的较好条件的斗争，而“社会主义意识则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党作为职业革命家组织，必须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才能把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政治斗争高度。如果“直接行动”先行，党“从中产生”，那就等于把党交给自发性、偶然性和敌人渗透，让革命变成无头苍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古田会议决议中，同样批判了“山头主义”“游击习气”和“单纯军事观点”，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没有先建党、确立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就不可能有铁的纪律和集中领导，直接行动只能是“左”倾盲动或右倾投降。贡萨罗主席在秘鲁革命实践中，把这一批判推进到当代高度。他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著作中明确指出：直接行动若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只能是“游击中心论”的变种或“行动主义冒险”，最终被敌人镇压或蜕变为修正主义。贡萨罗思想强调，党必须“先从意识形态上建起”，制定人民战争总路线，然后才能领导武装斗争；任何“行动先行、自然出党”的论调，都是对马列毛主义建党原则的背叛。历史教训更是血的证明。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个集中统一的马列主义政党领导。公社虽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但因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主导，缺少科学建党，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最终被凡尔赛反动派血腥镇压。中国革命早期，“左”倾盲动主义（如1927-1928年某些地区的“城市中心论”和“直接暴动”）正是因为没有先建真党、确立正确路线，导致根据地丢失、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正是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和思想建党，才纠正了这些错误，打开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道路。



秘鲁革命中，早期某些游击组织受“游击中心论”和“直接行动建党”影响，拒绝先从意识形态上重建真党，结果被军事独裁各个击破。贡萨罗主席及时纠正这一错误，先重建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确立贡萨罗思想为指导，然后于1980年发动人民战争，建立了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这一正反历史对比，雄辩地证明：凡是“直接行动建党”的路子，必然以失败告终；只有“先建党、再行动”的马列毛主义道路，才能取得胜利。当代现实危害更为严重，必须从多角度进行剖析。在修正主义堡垒（如中国）和第三世界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正利用“数字极权”和“维稳”体系，严密监控任何自发运动。“党是从直接行动当中产生的”论断，客观上为警察特务渗透大开方便之门：一些小团体以“街头抗议”“网络动员”“工厂罢工”为名，拒绝严肃的理论学习、秘密组织建设和两条路线斗争，结果沦为“表演式左派”或宗派小集团，被敌人轻易瓦解或收买。在数字时代，这一论断更易被“网络行动主义”利用：社交媒体上的“即时动员”“viral抗议”制造假左派幻象，制造“无中心、无纪律、无路线”的混乱，瓦解真正的革命力量。某些自称“毛主义”的组织，正是因为奉行“直接行动建党”，最终堕落为修正主义尾巴或资产阶级代理人，严重损害了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声誉。

从国际主义角度看，这一错误论断还割裂了全球革命的统一性。它否定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作用，鼓吹各国“各自直接行动”，客观上配合了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战略。贡萨罗思想强调，真正的建党必须是国际性的思想统一，先确立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普遍真理，然后在各国具体实践中建党。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全球战略态势。

必须彻底肃清这一错误论断的影响，坚持“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先行，组织上随之跟进”的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原则。建党绝不是“行动的副产品”，而是革命的灵魂和司令部。只有先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先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先组建忠于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领导核心，才能领导直接行动走向胜利，才能防止革命被修正主义或敌人篡夺。这场批判不是抽象的“学术争论”，而是当代反修正主义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重建真正革命党的必要前提。

总之，对“党是从直接行动当中产生的”错误论断的批判，再次证明了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它告诉我们：党必须先行，必须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先锋队；任何自发论、行动主义都是机会主义的遮羞布。今天，真正的革命者必须拿起这一批判武器，肃清错误思潮，立即投入从上到下政治建党的伟大实践，为人民战争和无产阶级政权奠定坚强的组织基础。

四、党和党的组织的结构：贡萨罗思想下的同心圆建设党和党的组织的结构问题，是建党理论的组织路线核心，是保证党成为革命司令部、领导人民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保证。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一贯强调：党的组织不是松散的“俱乐部”或“议会党团”，而是高度集中、纪律严明、与群众血肉相连的战斗堡垒。贡萨罗主席在当代把这一原理创造性地发展为“党—军队—统一战线”的同心圆组织结构，彻底解决了修正主义复辟条件下“如何重建真党、如何保证党的一元化领导、如何防止组织蜕化”的历史难题。这一结构不是机械的“层次划分”，而是辩证统一的革命组织形式：党是中心和灵魂，军队是党领导下的主要组织形式，统一战线和新政权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形式。三者同心同德、层层展开，形成不可战胜的革命整体。只有严格按照这一结构建党，才能在全球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堡垒猖獗的条件下，领导持久人民战争，直至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

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是列宁、毛泽东、贡萨罗思想一脉相承的组织路线灵魂。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既反对官僚主义的“专制独裁”，又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化”和“多中心论”。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和《关于健全党委制》中进一步发展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并强调“支部建在连上”，把党的组织深深扎根于基层群众和革命军队。贡萨罗思想在秘鲁革命实践中，把民主集中制提升到新高度，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必须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司令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地方党委、基层支部形成严密的组织链条，任何“多中心”“派系活动”“独立王国”都是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表现。贡萨罗主席反复告诫：“没有铁的纪律，就没有人民战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在当代条件下，这一原则要求党必须定期开展整风运动和两条路线斗争，及时清除党内走资派、机会主义分子和特务分子，保持无产阶级纯洁性。

贡萨罗思想的伟大贡献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军队—统一战线”的同心圆组织结构。这一结构是马列毛主义组织理论在帝国主义垂死阶段和修正主义复辟条件下的具体运用，是“党指挥枪”“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制度化体现。

同心圆的中心是党本身。作为革命的司令部，党必须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和秘密性。其组织层次清晰、职能明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负责制定总路线、战略决策和理论指导；地方党委（省、市、县级）负责贯彻中央路线、领导区域斗争；基层支部（工厂、农村、

游击队、学校)是党的战斗堡垒,直接联系群众、开展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和“五湖四海”,选拔忠于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具有群众观点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者。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地下党负责核心领导和情报保卫,合法掩护形式(如群众组织、合法刊物)用于扩大影响,但一切服从党的秘密核心领导,防止敌人“合法斗争”陷阱。

同心圆的第二圈是人民军(或革命武装力量)。这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主要组织形式,绝不是“独立军事集团”或“国家化军队”。贡萨罗思想强调:人民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实行“支部建在连上”、政治委员制度和军事委员会制度。军事委员会是党中央的派出机构,负责军事战略;政治委员和指导员负责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连队支部是军队的“灵魂”,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防止“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这一结构彻底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职业化”谬论(如邓小平集团推行的“军队非党化”),保证军队永远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而不是镇压人民的工具。在秘鲁人民战争实践中,正是这一结构使人民军成为“人民战争的学校”,既打击敌人,又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同心圆的外圈是统一战线和新政权(革命委员会或工农兵代表会议)。这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形式,绝不是“独立于党”的“群众自治”或“多党联合”。贡萨罗思想提出:统一战线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中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但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新政权采取“三结合”形式——革命干部、军队代表、群众代表相结合,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体现群众当家作主。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政权机关,负责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和群众动员。支部和群众组织(如贫农协会、妇女会、青年团)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防止“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

这一同心圆结构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保证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核心领导地位,防止了修正主义“党政分开”“军队国家化”“群众组织独立化”的组织路线复辟。修正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共同特征,就是把党降低为“选举机器”或“清谈馆”,把军队变成资产阶级工具,把群众组织变成“公民社会”的装饰品,最终导致党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贡萨罗思想的同心圆建设,则把党的组织路线与人民战争总路线有机统一:党领导军队,军队开辟根据地,根据地建立新政权,新政权又反过来巩固党的领导,形成革命的良性循环。

在当代实践中,这一结构必须结合具体国情灵活运用。在修正主义堡垒国家(如中国),建党初期以秘密地下支部为主,逐步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扩展同心圆;在第三世界半殖民地国家,则可较早建立公开的游击队支部和根据地政权。无论何种条件,都必须坚持“秘密建党为主、公开工作为辅”,利用一切合法形式掩护非法斗争,防止敌人“一锅端”。同时,定期开展组织整顿和两条路线斗争,是保持同心圆纯洁性的重要机制:反对“右倾投降主义”(放弃集中领导)和“左”倾冒险主义(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

总之,贡萨罗思想下的同心圆组织结构,是马列毛主义建党理论的当代最高发展。它告诉我们:党的组织必须是高度集中的战斗堡垒,必须以党为核心、军队为支柱、统一战线为外延;只有严格按照这一结构建党,才能在全球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领导人民战争,夺取政权,防止复辟。任何偏离这一结构的“创新”或“灵活”,都是修正主义在组织路线上的表现。今天,真正的革命者必须以这一结构为指南,立即投入从上到下政治建党的实践,为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开展人民战争奠定坚强的组织基础。

#### 五、从上到下政治建党的方法与实践

从上到下政治建党,是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在当代修正主义复辟和全球资本主义总危机条件下,重建真正革命政党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战术。它彻底区别于“从下到上自发建党”的右倾错误和“直接行动自然出党”的行动主义谬论,坚持“政治建党为核心、意识形态先行、组织路线服从政治路线”的原则。贡萨罗主席明确指出:“党必须先从上层、从意识形态上建起”,确立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指导地位,制定人民战争总路线,然后自上而下组建领导核心、扩展支部、展开同心圆建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方法不是机械的“命令主义”,而是辩证统一的革命实践:它把集中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把秘密建党与公开工作相结合,把思想斗争与组织整顿相结合,确保党从一开始就成为高度纯洁、纪律严明、与工农群众血肉相连的革命司令部。只有坚决贯彻这一方法,才能在敌人严密监控的“数字极权”时代和修正主义堡垒中,成功重建马列毛主义政党,领导持久人民战争,夺取无产阶级政权。

政治建党的核心在于“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贡萨罗思想强调,建党首先不是组织形式问题,而是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问题。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没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毛泽东《矛盾论》)。因此,必须先用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武装头脑,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确立“人民战争道路、反修防修、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总路线。只有这样,

党的组织才能成为“战斗堡垒”而非“清谈馆”或“选举机器”。这一核心要求我们：在建党全过程始终坚持“两条路线斗争”，及时清除党内走资派、特务分子和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永不变色。具体步骤与战术，可分为四个紧密衔接的阶段，每一阶段都体现“从上到下”的政治建党逻辑，同时紧密结合群众实践。

第一步：意识形态建设。这是政治建党的基础和灵魂。必须组织革命者系统学习马恩列斯毛原著和贡萨罗主席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怎么办？》、《古田会议决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经典文献。同时，深入批判赫鲁晓夫—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批判“直接行动建党”“自发论”“议会道路”等机会主义谬论。通过集体讨论、内部刊物、秘密学习班等方式，统一全党思想，确立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贡萨罗主席在秘鲁重建党时，正是通过这一步，先在少数忠实干部中确立贡萨罗思想为“第三阶段”，才避免了早期游击组织的盲动主义。这一阶段必须坚持“少而精、严要求”，反对形式主义和“读书俱乐部”倾向，把理论学习与现实阶级斗争分析紧密结合，培养出一批具有高度理论素养和革命坚定性的骨干。

第二步：从上到下组建领导核心。这是政治建党的关键环节。首先在意识形态统一的基础上，筹备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选拔那些经受过考验、忠于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具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干部担任核心职务。地方党委和临时筹备组随之自上而下组建，确保每一级领导核心都服从中央、贯彻总路线。干部政策严格执行“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和“五湖四海”，坚决反对“山头主义”

“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步必须高度秘密进行，利用合法掩护形式（如学术小组、工人互助组织）保护核心，同时开展内部整风，清除隐患。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现了全党统一，我们今天必须继承这一传统，在建党初期就建立铁的纪律和集中统一。

第三步：支部建设和群众工作。这是政治建党向基层的扩展和深化。中央和地方领导核心制定具体工作方针后，自上而下派遣干部深入工厂、农村、矿山、边远地区和知识分子群体，建立秘密党支部。支部是党的“战斗堡垒”，必须“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工厂”，直接联系最受压迫的工农群众，开展宣传鼓动、组织维权斗争和秘密调查研究。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把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革命高度，同时把经过考验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坚决反对“从下到上自发建党”的右倾错误——那种“先搞群众运动、再自然产生支部”的论调，必然导致支部脱离正确路线，被敌人或修正主义渗透。

这一阶段要灵活运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策略：用合法形式掩护非法斗争，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传播革命思想，但绝不依赖“网络公开化”，始终保持党的地下核心领导。

第四步：同心圆展开。这是政治建党的全面展开和最高阶段。在支部和群众工作基础上，逐步建立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或革命武装力量）和统一战线、新政权。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制度和“支部建在连上”保证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政权形式把工农兵学商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这一展开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边建党、边斗争、边巩固的过程：在根据地建设中不断整顿党组织，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纯洁队伍，确保同心圆始终以党为核心，防止任何“独立化”倾向。

政治建党的原则与方法，必须贯穿始终：一是秘密建党与公开活动相结合。在修正主义堡垒和帝国主义国家，初期以地下秘密工作为主，逐步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扩展；在第三世界半殖民地国家，可较早建立公开的游击队支部，但始终坚持“非法斗争为主、合法形式为辅”。二是思想斗争与组织整顿相结合。定期开展整风运动，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党内矛盾。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集中领导相结合。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四是坚决反对“从下到上自发建党”的右倾错误和“直接行动先行”的冒险主义，确保建党过程不脱离群众、不被敌人“一网打尽”。

当代实践指导，必须立足具体国情。针对中国这样的修正主义堡垒，提出“农村先行、城市配合”“利用合法掩护深入工农”的战术：在边远山区和工厂区秘密建立支部，逐步形成根据地雏形；针对第三世界半殖民地国家，强调“武装斗争与建党同步推进”，以人民战争开辟建党空间。数字时代的新特点要求我们：利用加密通讯和地下网络传播理论，但绝不把建党寄托于“网络动员”，防止敌人“大数据维稳”。无论何种条件，都必须把建党过程与群众日常斗争紧密结合，让党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发展壮大。

从上到下政治建党的方法，是贡萨罗思想对马列毛主义建党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它保证了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自觉性、组织性和战斗性，避免了自发论和行动主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只有坚决贯彻这一方法，才能在全球资本主义总危机中，重建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领导人民战争，夺取无产阶级政权。

六、结论：高举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旗帜，重建真正的革命党

通过以上五个部分的系统阐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先建党是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根本要求，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和组织保证，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无产阶级重新夺取政权、

开展人民战争、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必由之路。从马列毛主义经典论述到贡萨罗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从“为什么要先建党”的理论基础到对“党是从直接行动当中产生的”错误论断的彻底批判，从贡萨罗思想下的同心圆组织结构（党—军队—统一战线）到从上到下政治建党的具体方法与实践，本文全面论证了：没有真党，就没有革命；没有先从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上建党，就没有铁的纪律和正确路线，就不可能领导持久人民战争，直至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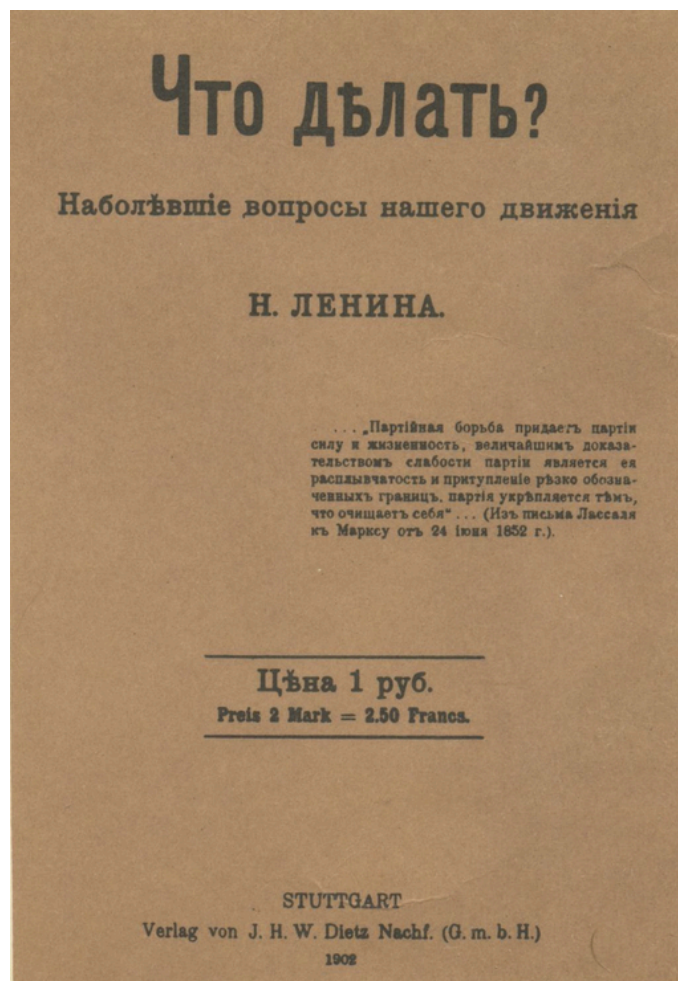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但这一胜利从来不是自发的，而是必须由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来领导。列宁指出，没有革命家组织就不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毛泽东强调党是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贡萨罗主席更明确宣告：“没有党，就没有革命；没有真党，就没有人民战争。”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苏联和中国修正主义复辟的惨痛教训、巴黎公社和早期盲动主义的失败案例、秘鲁光辉道路先建党再人民战争的成功实践，都从正反两方面雄辩地证明：任何“自发论”“行动主义”“直接行动建党”的机会主义谬论，都只能把革命引向失败，客观上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服务。今天，面对帝国主义垂死挣扎、修正主义堡垒（中国等）的暂时猖獗，以及全球工农群众自发斗争的涌现，真正的革命者必须立即行动，肃清一切错误思潮，高举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伟大旗帜，从上到下政治建党，重建同心圆结构的真正革命党。

资本主义总危机为革命提供了客观条件，但主观上需要一个高度集中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司令部。只有先建党，才能制定人民战争总路线，才能培养忠于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的革命干部，才能把分散的自发斗争统一为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才能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开辟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全球战略态势。建党先行、建党贯穿始终，是辩证统一的革命要求；同心圆组织结构和从上到下政治建党方法，则是保证党永不变色的制度保证。数字时代的新特点——“数字极权”监控与网络传播——更要求我们坚持秘密建党为主、公开工作为辅，利用一切合法形式掩护非法斗争，绝不把希望寄托于“网络自发”或“直接行动”。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才能指导我们建真党、打胜仗；一切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行动主义、自发论都必将被历史抛进垃圾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以“造反有理”“继续革命”的战斗精神，立即投入重建革命党的伟大实践：深入工农群众，开展意识形态建设，两条路线斗争，准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人民战争、为无产阶级政权、为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天，革命的火种已在全球点燃。让我们高举马列毛主义、贡萨罗思想红旗，重建真正的革命党，投身于埋葬一切剥削制度的伟大事业。胜利必属于坚持先建党、坚持人民战争的无产阶级！



# 无地者之日：帝国主义政策与无地危机

人民斗争国际联盟



国际人民斗争联盟就2026年无地农民日发表声明 国际人民斗争联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纪念2026年无地农民日，与所有为争取土地和生产性生计的合法控制权而斗争的人们团结起来，响应“捍卫我们的土地和领土，捍卫农民的权利和资源，推进人民主导的真正土地改革”的号召！值此无地农民日之际，联盟重申，真正将土地归还给耕种者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斗争推翻美国帝国主义及其法西斯地主傀儡政权。如今，农民、原住民、渔民以及所有为社会生产粮食的人们，大多都失去了土地，这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掠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土地和资源。美国霸权主义肆意巩固了我国的土地匮乏状况，许多国家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之下。半殖民地国家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寄生关系，使其得以获取并控制土地和自然资源，同时加深了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剥削。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也开始运用不同的帝国主义政策来控制我国的土地和资源。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机构的政策枷锁下，农民的土地和资源权利荡然无存。我国国家实际上沦为警察国家，任何要求真正分配土地的农民运动都遭到残酷镇压。与此同时，剥削性的农业化学生产方式却得以维持，使地方封建精英和帝国主义国家从中获利。小农户、佃农、合同农户和农业工人由于使用价格极其昂贵但对农业化学工业化生产至关重要的外部农用化学品，而陷入了债务的恶性循环。作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一项特殊工具，绿色革命技术导致土地过度依赖化肥；一旦停止使用化肥，土地生产力几乎降至零。因此，农民被束缚于农用化学品生产体系，年复一年地陷入债务的恶性循环。另一种奴役负债累累的农民的手段是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放松管制意味着取消政府对农民的经济支持。私有化使大型企业能够控制整个农业投入品供应链，并垄断市场。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向外国资本投资开放本国产业，并引入从《农业协定》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一系列世贸组织协议以及其他帝国主义机制。各国政府对特定经济作物提供特殊优惠，导致传统营养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例如，推广杂交玉米而非小米，或强制执行严苛的转基因种子使用法规，这些政策在亚太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普遍存在。几十年来，这些措施迫使农民出售他们仅有的小块土地，加剧了土地匮乏的状况。贸易自由化促使许多国家投资于全球南方的土地项目。例如，阿联酋在东非的投资额高达470亿美元。据估计，阿联酋获得了近25万公顷的土地——其中包括阿布阿马马港项目，该项目本身就占地约161,874公顷，其中农业用地面积尤为突出。在苏丹，由阿联酋支持的战争导致超过124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流离失所地遍布苏丹境内外。这种土地迁移并非偶然——其目的是为了清理土地，以便出售用于农业生产。阿联酋一直在大力投资，既是为了生产饲料，也是为了保障自身的粮食安全。在东非，12个国家中有9个卷入武装冲突，这表明，由于新殖民主义野心企图控制他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这些国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深刻的裂痕。人们不仅为了保障粮食安全而寻求土地，也为了发展可再生能源。因此，除了提高甘蔗、玉米和其他农用燃料的产量外，还需要土地来建设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机和水力发电项目。随着投资者蜂拥而至，抢占农田，农民们失去了土地，尤其是在我们许多南方国家，他们通常没有土地所有权文件来证明自己对所有权的土地的所有权。土地匮乏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气候危机。

债务问题与半殖民地密切相关。由于半殖民地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帝国主义组织便会想方设法控制其土地和其他资源。对于那些接连遭受气候灾害的国家而言，这种情况尤为突出。目前，近50个国家正在研究一种名为“债务换气候与自然”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一国的政府债券或贷款会被收购，并以利率更低的新债券或贷款取而代之，前提是该国政府承诺将节省下来的部分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作为债务偿还优惠的交换条件，该国会被割让大片土地，用于所谓的“环境安全和土地保护”。在许多情况下，此类项目迫使原住民离开家园，或限制了他们获取当地资源、森林和渔场的权利。虽然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组成的利益集团从中获利，但却使农村和原住民社区更加贫困，社会关系也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提升和生态旅游等机制正被用来为企业和金融投资者攫取巨额利润。对陆地和海洋关键矿产资源的疯狂开采也加剧了土地匮乏问题。印度东部和中部地区驱逐阿迪瓦西人（印度原住民）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他们的土地富含铝土矿，而铝土矿是生产铝的关键基础矿物，深受武器工业的青睐。阿迪瓦西人被贴上了“纳萨尔派”的标签，在奥里萨邦和恰蒂斯加尔邦已有数千人被杀害。同样，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农民也因开采钴、铜、金等多种矿产而被强行驱逐。虽然全球南方无地人口的具体统计数据尚不明确，但超过十亿人从事农业，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地农民。在亚洲，可以肯定地说，超过一亿农民是无地农民。在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有近78%和71%的农村家庭无地。同样，在菲律宾，近2000万农村家庭中，只有约400万户拥有稳定的土地所有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近7500万人无地或土地所有权不稳定。无地状态的影响极其深远，涵盖社会、经济和政治各个领域。首先，当然是普遍存在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目前，近7.5亿人遭受饥饿，另有23亿至24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规律的膳食。农村社区中最边缘化的群体，例如少数宗教信徒、种姓和种族群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遭受着极端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无地者的生活不断变化，他们被迫从一种生计方式转向另一种；他们从一个农村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农村地区，或者从农村迁徙到城市，寻找任何可以找到的工作。甚至最终流亡海外，面对屈辱和屈辱的生活，遭受剥削和虐待。负债累累的佃农受制于富有的或封建的地主。他们的工资没有保障，家人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他们的工资却停滞不前，他们越来越深受通货膨胀、气候危机和战争的折磨。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全球南方的农民来说，土地就是生命。为了获得尊严、体面的生活、安全营养的食物，唯一的出路就是广泛组织起来，在各个领域——从农民到原住民——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土地而战。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伊朗的种族灭绝战争以及委内瑞拉和古巴正在发生的暴行已经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势力，特别是美国，正在发动一场旨在重新殖民世界的进攻。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卫星国对土地的需求日益增长，用于可再生能源、关键矿产以及粮食安全，世界各地农民面临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只有农民、原住民，从地方到区域乃至全球，团结一致，才能战胜美国帝国主义。我们的工作建立这种团结，不仅要争取土地权，更要争取民族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政策。斗争不再遥不可及，它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奋起反抗！

签名：人民斗争国际联盟

**来源：人民斗争国际联盟**

**<https://peoplesstruggle.org/en/imperialisms-policies-and-crisis-of-landlessness/>**

# 团结起来，支持印度人民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法西斯莫迪政权！停止“卡加尔行动”！

人民斗争国际联盟



团结起来，声援印度人民，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法西斯莫迪政权！停止“卡加尔行动”！

人民斗争国际联盟（ILPS）与国际土著人民协会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委员会联合发表声明

今天，3月28日，国际土著人民协会呼吁印度人民，特别是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人民，谴责莫迪政权以“卡加尔行动”为名，对人民抵抗运动进行暴力镇压。这种企图扼杀正义人民运动的行径，是莫迪政权印度教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恶毒标志，并导致了无数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卡加尔行动”始于2024年1月1日，一名名叫曼格利·索迪的6个月大的阿迪瓦西族女婴被杀害；当时她正在接受母亲的哺乳。索迪之死标志着针对阿迪瓦西人、农民、宗教少数群体和活动人士的一系列暴力事件的开始，而这些暴力事件至今仍在持续。“卡加尔”（Kagaar）一词直译为“最终解决方案”，印度政府声称，该方案将在2026年3月31日之前终结印度的“毛主义极端主义”。这一承诺在过去几个月中被反复提及，并被用作国家暴力升级的借口，以应对阿迪瓦西平民、活动人士和丧失战斗力的革命战士。2024年初，印度政府开始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200多个县部署约6万名法西斯军事和准军事部队，而且人数还在与日俱增。在横跨20至25个村庄的扫荡性军事行动中，每个村庄都驻扎着1500至3000名士兵。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士兵与村民的比例可能高达3:1。2024年1月至2026年3月期间，对涉嫌叛乱分子和“同情者”的逮捕人数超过1033人，强迫投降人数超过900人，法外处决案件超过750起。由于极端的军事化和镇压，实际数字可能高于报告的数字。“卡加尔行动”在帝国主义和印度统治阶级中的作用“卡加尔行动”是纳伦德拉·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法西斯幻想的一部分，与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以及莫迪所属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准军事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共同实施。“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是一种法西斯意识形态，旨在通过压制甚至消灭宗教和民族少数群体，例如穆斯林、基督徒、阿迪瓦西人（Adivasi，印度原住民）以及东北部各民族和低种姓群体（如达利特人），建立一个单一的印度教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直接借鉴了欧洲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例如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印度全国有700多个土著群体，使用121种语言（如果包括各种变体，则超过1000种）；穆斯林占总人口的14%——这些少数群体正是莫迪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服务团（BJP-RSS）企图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法西斯统治下抹杀的对象。对于外国垄断资本而言，“卡加尔行动”（Operation Kagaar）是开发印度中部和东部山区和森林的必要步骤。这些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包括铁矿石、煤炭和铝土矿等，这些都是工业、能源和武器生产所必需的资源。长期以来，像阿布杰马德这样的山区以及其他一些地区一直禁止外国资本进行采矿、伐木和其他活动。

这些地区常被称为“红色走廊”，一直是革命人民抵抗和自治的堡垒，并有效地保护了原住民土地免遭帝国主义掠夺。因此，美国帝国主义及其盟友全力支持莫迪的恐怖统治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两年，美国向印度出口了价值50亿至60亿美元的武器，包括无人机、导弹和直升机，这些武器目前正被用于“卡加尔行动”。此外，2019年至2024年间，以色列武器出口总额的34%出口到了印度，使印度成为以色列武器的最大市场。“卡加尔行动”与所有由美国帝国主义设计和资助的反叛乱行动一样，注定会失败。此类纲领妄图以野蛮暴力结束人民发动的正义革命战争，却蓄意无视武装冲突紧迫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根源。印度人民，不仅在印度中部和东部，而且在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包括民族解放战士，都展现了反对莫迪印度教法西斯统治的坚定决心。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都必须支持和声援这些斗争，因为它们对于尽可能削弱帝国主义具有重大意义。联盟呼吁其成员、各分会和盟国组织，各界人士和运动声援印度人民，反对“卡加尔行动”。为此，我们必须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真面目，他们武装并资助了这场针对印度原住民、穆斯林少数民族、无地农民、工人和青年的战争。停止“卡加尔行动”！

签名：人民斗争国际联盟（ILPS）及其下属的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委员会（ILPS第十委员会）

**来源: 人民斗争国际联盟**

**<https://peoplesstruggle.org/en/rally-behind-the-peoples-of-india-against-the-hindutva-fascist-modi-regime-stop-operation-kagaar/>**

# 雇佣劳动与资本（第四部分）

德国  
K·马克思

首先必须承认，所得出的结果依然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是经过相反的途径得出的。固然，利润的增加不是由于工资降低，但是工资的降低却是由于利润的增加。资本家用同一数量的他人的劳动，购得了更多的交换价值，而对这个劳动却没有多付一文。这就是说，劳动所得的报酬同它使资本家得到的纯收入相比却减少了。

此外，我们还应提醒，无论商品价格如何波动，每一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即它同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总是由它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因此，资本家相互间的盈亏得失必定在整个资本家阶级范围内互相抵销。改进机器，在生产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和资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但决不是创造出更多的交换价值。如果我用纺纱机能够在一小时内生产出比未发明这种机器以前的产量多一倍的纱，比方从前为50磅，现在为100磅，那么我在一定时间内用这100磅纱所交换到的商品不会比以前用50磅交换到的多些，因为纱的生产费用减少了一半，或者说，因为现在我用同样多的生产费用能够生产出比以前多一倍的产品。

最后，不管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也好，整个世界市场的也好）相互之间分配生产所得的纯收入的比例如何，这个纯收入的总额归根到底只是直接劳动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在总体上增加的那个数额。所以，这个总额是按劳动使资本增加的比例，即按利润与工资相对而言增加的比例增长的。

可见，即使我们停留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范围内，也可以知道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资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而利润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价格，相对工资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以同一比例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30%，那么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

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就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残羹剩饭就越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越多。

这样我们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资本的尽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的利益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

最后：

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过就是说：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与它敌对的权力，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被允许在越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而工作，满足于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

五

然而，是不是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资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我们不当听信他们的话。我们甚至于不能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似乎资本长得越肥，它的奴隶也吃得越饱。资产阶级很开明，很会打算，它没有封建主的那种以仆役队伍的奢华夸耀于人的偏见。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迫使它锱铢必较。

因此我们就应当更仔细地研究一个问题：

生产资本的增长是怎样影响工资的？

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资本整个说来是在不断增长，那么劳动的积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资本的数量和规模日益增大。资本的增大加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规模的不断增大，为把装备着火力更猛烈的斗争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军引向产业战场提供了手段。

一个资本家只有在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的资本。可是，要能够更便宜地出卖而又不破产，他就必须更便宜地进行生产，就是说，必须尽量提高劳动的生产力。而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越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越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越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因此，资本家之间就发生了全面的竞争：他们竭力设法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可是，假如某一个资本家由于更细地分工、更多地采用新机器并改进新机器，由于更有利和更大规模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样多的劳动或积累起来的劳动生产出比他的竞争者更多的产品（即商品），比如说，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他的竞争者只能织出半码麻布，他却能织出一码麻布，那么他会怎么办呢？

他可以继续按照原来的市场价格出卖每半码麻布，但是这样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出战场，就不能扩大自己的销路。可是随着他的生产的扩大，他对销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采用的这些更有效率、更加贵重的生产资料使他能够廉价出卖商品，但是这种生产资料又使他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商品，为自己的商品争夺更大得多的市场。因此，这个资本家出卖半码麻布的价格就要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些。

虽然这个资本家生产一码麻布的费用并不比他的竞争者生产半码麻布的费用多，但是他不会以他的竞争者出卖半码麻布的价格来出卖一码麻布。不然他就得不到任何额外的利润，而只是通过交换把自己的生产费用收回罢了。如果他的收入终究还是增加了，那只是因为他推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因为他比其他资本家更多地增殖了自己的资本。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价格定得比他的竞争者低百分之几，他追求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压低价格就能把他的竞争者挤出市场，或者至少也能夺取他的竞争者的一部分销路。最后，我们再提一下，市场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生产费用，这取决于该种商品是在产业的旺季出卖的还是在淡季出卖的。一个采用了生产效能更高的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卖价超出他的实际生产费用的百分率，是依每码麻布的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迄今的一般生产费用为转移的。

可是，这个资本家的特权不会长久；参与竞争的其他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采用这些机器和分工。这些新措施将得到广泛的推广，直到麻布价格不仅跌到原先的生产费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产费用以下为止。

这样，资本家的相互关系又会像采用新生产资料以前那样了；如果说他们由于采用这种生产资料能够以同一价格提供加倍的产品，那么现在他们已不得不按低于原来的价格出卖加倍的产品了。

在这种新生产费用的水平上，同样一场角逐又重新开始：分工更细了，使用的机器数量更多了，利用这种分工的范围和采用这些机器的规模更大了。而竞争又对这个结果发生反作用。

我们看到：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变革，不断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

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抛出原先的轨道，并且因为资本已经加强了劳动的生产力而迫使它继续加强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

这个规律正是那个在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中必然使商品价格和商品生产费用趋于一致的规律。

不管一个资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资料，竞争总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而一旦竞争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他的资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一后果就只能是：要保持原来的价格，他就必须提供比以前多10倍、20倍、100倍的商品。可是，因为现在他必须售出也许比以前多1000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产品数量的办法来弥补由于售价降低所受的损失；因为他现在必须卖出更多的商品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并且也是为了补偿生产费用（我们已经说过，生产工具本身也日益昂贵）；因为此时这种大量出卖不仅对于他而且对于他的竞争对方都成了生死问题，所以先前的斗争就会随着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来。所以，分工和机器的采用又将以更大得无比的规模发展起来。

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竞争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说，越是有可能便宜地生产，即有可能用同一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争就使更便宜的生产即为了同一价格总额而提高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规律。可见，资本家努力的结果，除了必须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提供更多的商品以外，换句话说，除了使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恶化以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此，虽然竞争经常以其生产费用的规律迫使资本家坐卧不宁，把他为对付竞争者而锻造的一切武器倒转来针对他自己，但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在竞争中取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更便宜地进行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以代替旧机器和旧分工，并且不等竞争使这些新措施过时，就这样做了。

现在我们如果想象一下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同时笼罩了整个世界市场，那我们就会明白，资本的增长、积累和积聚是如何导致不断地、日新月异地、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旧机器。

# 导师语录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

列宁-论两个政权

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都可以归结为阶级变动。因此，启发群众的觉悟，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析这一革命中究竟发生了和发生着怎样的阶级变动。

列宁-阶级变动

